

延安見聞錄

金東平著

民族書店印行

金東平著

延安見聞錄

民族出版社印行



3 0664 2018 7

628.504
387
2

目錄

緒言

第一章 在「長征」以前……………(一)

一、中共爲什麼要離開江西？

二、「長征」的準備工作

三、別了！「中國的莫斯科」

四、中共爲什麼要走向陝北？

第二章「長征」的開始和結束……………(二八)

一、爲什麼要走上「二萬五千里」？

目錄

63566

延安見聞錄

二

二、「長征」在進行中

由江西到貴州 貴州的「突圍」 過雲南 竄進西康 退入川北 由甘肅到陝西

三、「長征」插曲

茅台酒濯足 偷渡兩條江 猩猩國的女皇 搶過瀘定橋 川北過番區 人間奈何橋 三十女戰士

第三章 到了陝北……………(四四)

一、團結露曙光，中共宣言「共赴國難」

二、良辰易逝，「統一」類曇花

由紅軍的改編到「新四軍」事件「邊區」的設立和「邊幣」的行使 黨內暗潮
與張國燾出走

第四章 今日的延安

(六七)

一、中共的「黨」「黨員」和「黨的幹部」

中共的黨員 中共的黨的幹部

二、中共的「民主政治」

「陝甘寧邊區」各級參政會的選舉 中共的民衆組織工作 中共對於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的運用

三、中共的軍事

士兵的教育 兵員的補充 作戰的實力

四、中共的財政與經濟

關係「邊區」生命的食鹽 開荒和農業稅 邊區的工商業 合作社和銀行

五、中共的宣傳文化教育與社會司法

目 錄

三

延安見聞錄

四

中共怎樣宣傳 游擊式的教育 不寫黑暗的文藝 簡單的社會生活 活潑的
司法

第五章 記者團在延安……………(一二九)

- 一、疲勞招待與中外分居
- 二、延安沒有新聞檢查
- 三、延長自由採訪的一幕
- 四、活用辯證法

附錄延安歸來有感……………(一五三)

結語……………(一六三)

緒言

在世界民主潮流洶湧澎湃急需發展的今天，中國共產問題却竟然成了問題，可以說，實在是我國近三十年來歷史過程中，最黯淡的一頁，也可以說，現在是我國目前內政中一件不容諱言的「大事」。尤其是七七事變以來，全國需要團結禦侮的期間，舉凡中共一言一行，都無不為關心國是的同胞所注意。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的發表，雖然博得了國內上下的莫大的歡欣，而三十年一月十二日「新四軍事件」的爆發，却又曾引起了各界人士不少的憂懼。這種歡欣與憂懼的產生，固足以說明全國同胞對於國家民族熱望之深，而這種歡欣與憂懼的產生，也充分的說明了全國同胞對於問題的真相之不够了解，對於事實的發展之無法測知。

中國共產黨自從毛澤東先生在十八年一月到了江西，在瑞金成立了第一個「中央蘇維

埃政府」之後，便一直的和外界隔絕着；十餘年來，雖然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而到達陝北，但是「邊區」裏的聲息，却依舊與「蘇區」一樣的和外界不通。後方的同胞們所能知道的一些中共的情形，大半不是由於中共的自我宣傳，便是由於道聽途說；以致於有些人以爲「蘇區」與「邊區」簡直美麗得如同天堂，也有些人以爲「蘇區」與「邊區」簡直黑暗得如同地獄。固然，中共的自我宣傳，有時是不免過分誇張，可是，道聽途說，却也多半是出諸臆測。因此，在後方同胞腦海中的中共問題，遂如墮五里霧中，紛紛然莫衷一是。

我們要知道中共問題，何以成爲問題，要想了解中共問題之何以懸而不決，最低限度，我們便要對中共本身的歷年來的演變，首先有一個相當的了解。然後，我們方能進一步去要求中共問題何以成爲問題的癥結，中共問題何以懸而不決的關鍵。

民國三十三年夏季，作者曾經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由重慶跑到延安去住了一個多月；時間雖然是那樣的短促，但是，在各地主人殷勤的招待與每天爲我們所排定的緊

湊節目中，也未嘗不可以走馬看花般的參觀一個大概，陝北歸來之後，作者本想將我所知道的中共情形寫成一本小書，以供各界參考，無奈俗事煩忙，一直到現在都不曾執筆。

最近，中國國民黨的六大大會中，已經通過了國民大會的召開日期，并且一再的宣示了還政於民的初衷實施憲政的步驟，等到政治團體結社法公佈之後，中國共產黨便可以取得合法的地位，正式的公開活動了，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身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黨？而中國共產黨的施政方針又是怎樣呢？這一點，實在是我們所急於要想知道，而且必需應該知道的。我們要明瞭這一個問題，自然不得不先從中共在「邊區」的情形和措施看起來，目前介紹陝北「邊區」的文章，各報已迭有記載，即就專書而言，也早有了趙超楊君的延安一月和張文伯君陝北歸來；但是，單就日前陝北「邊區」的情形來看中共的動向是不够的，古人說：「鑒往知來」，我們要知道中共的將來，便不得不追溯中共的過去；我們一定要明瞭中共由「蘇區」到「邊區」這一過程中的演變，才看得出中共的進步之道與其將來的發展。

延安見聞錄

四

因此，作者在由重慶到延安的旅程中，不但是拜訪了不少的中共高級人員，也會了不少的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士，同時更在山西的克難坡與延安的交際處，加當年「統一戰線」的朋友們談論了多次，方對中共近十年來的轉變過程，有了一個概念。

現在，我僅就這次延安之行中的所見所聞，分類報告出來，寫成了這本「延安見聞錄」的小書，以備關心中共問題同胞之參考，希望這本小冊子的讀者們，能從中共十年來演變的事實中，自己去尋求出中共將來所要走的道路，并企望能有助於中共問題的政治解決。

因此，作者在這本書中，僅將所見所聞的事實予以忠實的報道，而作者自己却不再做任何結論和批評。

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於重慶

第一章 在「長征」以前



民國二十一年秋季，祕密潛伏在黃浦江濱的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澤東先生的建議，由工人階級集中的上海，踏進了落後農村的瑞金。這一期間，正是贛南「蘇區」的黃金時代，當時，政府爲了外有「九一八」「一二八」之變，內有「閩變事件」的發生，以致對於贛南「蘇區」的四次圍剿。每次都攻敗垂成，反而給了紅軍以極好發展的機會。五六年中，總先不過六七萬人的紅軍，竟增加到三四十萬左右。一直到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屆全中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舉行時，毛澤東先生雖然取得了中共黨內絕對的統制權，而當選爲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主席，不料好景不常，噩運便在這時，緊跟着光臨了「蘇區」。國軍第五次圍剿隨着「閩變」的戡定而一步步的加緊。贛南的經濟情形，也由於封鎖的關係而日益惡化，同時，再加上中共黨內對「蘇區」以外活動的機會一

天天的減少，黨員數量的逐漸降低，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另謀出路。在廣昌建寧之役，陳誠將軍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以後，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便在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開始了。毛澤東先生經營了十多年的贛南「蘇區」，便從此夢幻般的消逝。

一：中共爲什麼離開江西？

中共之所以要由贛南竄向陝北，原因是異常的複雜的。軍事上的失敗，固然是一個最大的主因，而當時「蘇區」內政治經濟情形的惡化，也都是逼迫着中共中央不得不另作打算的主要因素。

軍事方面，中共軍事方面的失敗，固然是爲了國軍由於四次圍剿的經驗中，發現了紅軍的弱點，改正了自己已往的錯誤的戰術之成功。而另一主要的原因，則不得不歸結到紅軍本身的戰鬥教育與精神教育畸形發展的誤事。

紅軍的實際素質與中共理想中的目標相差得是異常的遙遠的。在我國的農村社會裏，

凡是多少可以受到一點教育的青年，大概多半是出生在中上級資產的家庭中。當朱德與毛澤東兩位先生率領着紅軍游擊于湘贛皖閩諸省時，稍微具有一點知識的人士，都早已震懾於紅軍「打富豪」「殺劣紳」的口號，逃避得一乾二淨，剩下來的，除了一些無力流亡的貧苦農民以外，大都是無業游民和一些江湖上的英雄好漢。紅軍的隊伍，在歷次作戰的損失下，既然不得不將就這些亡命之徒來加以補充，於是，紅軍的訓練也就自然而然的不得不因人施教而加以變更。

這些四面八方緊攆來的亡命之徒，有的根本不會受過什麼教育，有的自小便在非人的環境中長大，他們根本上不懂得什麼叫做主義，如果沒有具體的利害擺在面前，便無法對於他們施以精神教育。所以，中共對於紅軍講到任何問題的時候，都得要舉出明顯而具體的例子來，才能够收到一點效果。但是，階級鬥爭和共產主義又有什麼專例可以比譬呢？有之，階級鬥爭便是殺人，共產主義便是奪掠。自然，就這樣直率的叫紅軍來殺人奪掠，中共也絕不自知其錯誤，可是除此之外既無他途可循，於是便只好在殺人的目標上加

以富豪劣紳的字樣，在奪掠範圍裏畫上資產階級的面目。因此，「打殺資本家」，「撲滅資產階級的武力」，「解放無產者」，「分配財富」，「自由享受」等等，都深深的灌入了紅軍的腦中。

「我們踏進白區，我們自由的享受他們的財富！」

「資產階級的白區，範圍大得很呢！對方有了準備，我們可以換個方向進攻。」

當時鼓勵紅軍奮勇作戰的精神的，實在可以說是完全得力於這些口號。加以紅軍歷年來都生活在戰鬥中，根本上便沒有時間進行基本的軍事訓練，而只教士兵以射擊爬山跑路的技術，所以紅軍作起戰來，便只能適用於流竄式的攻擊，而不能據守陣地佔領城池，以致於國軍發動第五次圍剿，採取步步為營的堡壘戰術以後，便無能為力，而不得不狼狽西竄了。

經濟方面，中共在經濟方面的失敗，最大的原因是由於土地革命和限制資本的錯誤。次一原因，才能够數到國軍的嚴密封鎖。

當中共成立了「蘇區」，而中共中央也由上海到瑞金以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運動，可以說是已經告一段落，而將其發展勢力的對象移於農民。「打富豪」，「分田地」，便是中共號召農民實行共產革命的唯一動聽的口號。一般貧苦的農民爲了要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因而加入共產黨者，爲數實在不少。但是，爲了土地革命不合我國實際環境的要求，使得中共的「土地法」接連頒佈了三次之多，結果還是不能適用。關於沒收土地問題，因爲當時中共認爲要實行土地革命首先便得先從「打富豪」做起，而當時的「蘇區」內又流行着「有土皆豪」的口號，以至於無論尺土寸地，凡有「土」地的人全都成了「土豪」。是土豪，便該挨打，這樣亂打一氣的結果，連中共自己也承認「土地革命太左，使小資產及軍官發生反感」的事實。關於分配土地問題，則爲了「土地法」一改再改，始終未能適用，致中共雖在「蘇區」盤據數年之久，而農民們不但未曾分得一寸土地，甚至於連從前租佃得來的土地也因爲已被沒收而瀕於荒蕪。

中共在贛南「蘇區」所施行的經濟政策，是限制資本主義的經濟。根據「全中國蘇維埃

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所規定「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條，中共制定了在「蘇區」內的「經濟政策條例」，對於經濟的發展限制得極爲嚴厲。便由於限制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於嚴格，以至事實上却形成了憎惡資本的政策，否認了資本的功用，在當時的蘇區中的民衆如有一二百元者，都有被日爲資本家的可能，與遭受「徵發」，「沒收」的危險。遂使稍有資本者，寧願攜帶現款逃走，或則埋藏地下，而不敢出頭經營工商各業。直到民窮財盡，土地荒蕪，商店關門，工業停頓，中共才竭力想法來改善造成這些惡果的因素。可是，「蘇區」在歷年來提倡階級鬥爭影響下，一般人民率多游手好閑不務正業以博取無產階級的尊稱，縱然中共在「蘇區」內竭力提倡「春耕」，「夏耕」，「秋耕」，「冬耕」，與「消滅荒田」，「開發商業」，「提高生產」，等等運動，而效果却仍舊是微乎其微，對於「蘇區」經濟崩潰的情形，絲毫未能改善。

民國二十二年國軍圍剿「蘇區」之初，便採取了穩打穩紮的戰略，依藉着公路堡壘步步爲營的由四面八方逐步圍進。這次紅軍的流竄戰術已經失去了作用，而不得不一步步的

向後撤退。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的夏季，「蘇區」已經僅剩了寧都，興國，廣昌，瑞金，上杭，長汀等縣。「蘇區」一縮小，馬上便發生一個嚴重的問題，紅軍的給養，已經不能維持了。因為所剩的縣份，經過數年來土地革命與限制資本，生產者大半都抽調做不事生產的紅軍，早已土地荒蕪，商業凋零，在平時，紅軍大部份在各地「游擊」。給養問題。還不至十分嚴重，到了「蘇區」日漸縮小，而各地退下來的紅軍數目又相當的龐大，米糧的缺乏，幾乎到了無法供給的程度，而最嚴重的問題，則是在國軍的封鎖下，食鹽無法進口。「蘇區」的食鹽，本來是一部份取給於閩粵沿海，一部份則全靠由贛北輸入的長江兩岸的淮鹽。當國軍封鎖辦法實行之後，中共便開始限制的食用。但是，全靠節流而不能開源，終久不是辦法，不久連硝鹽也吃光了，老百姓就挖下牆根霉溼的泥塊，拿來熬煎出一點鹹味，當做鹽來應用。偶而，「蘇區」內也可見到一點點鹽來，據楊尚昆先生說，那一點點的食鹽，還是裝在糞桶裏偷過封鎖線而運入「蘇區」的。

政治方面，自從民國二十一年中共中央道至瑞金以後，紅軍的發展雖然速度很大，而

中共在各地的活動却一天一天的減少起來，一直到二十三年二月，中共在瑞金召開第六屆五中全會時，這一個潛伏的危機更加明顯。民國二十年三月，中共在非「蘇區」的黨員，尙有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人。到民國二十三年，便只剩下九千九百三十人了。而「蘇區」以內的黨員在這兩年之中，却由五萬增到十萬。這一畸形的發展，一方面說明了中共的活動地正在逐漸減少，另一方面更說明了中共除開「蘇區」以外不但不能吸收黨員，連舊有的黨員也無法維持。同時，再據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中共五中全會時的調查，當時中共的黨員社會成份，是工人佔百分之五。八，農民佔百分之八十二，士兵佔百分之八，智識份子佔百分之四十二。中共是一個以代表無產階級爲號召的政黨，現在，工人階級的黨員，竟然微小到不及農民階級的黨員數目的十五分之一簡直是說明了，中共的黨已經脫離了無產階級。更加以中共的五中全會裏通過了一個「保存幹部決議案」，將非「蘇區」的工作幹部，大批的調回「蘇區」。於是，兩個重大的錯誤，便由此日益加深。

第一，中共的工作幹部，既然大批的都調回「蘇區」；則非「蘇區」的活動，當然

也就在無形之中宣告停止。同時，所有的「蘇區」土地面積，連各地各個零碎的「蘇區」在內，也還不及我國全部領土面積的一千七百分之一，在這一點點小的落後的農村社會裏，要想大量的擴充黨員，事實上自然非常不易。

第三：中共在平、津、滬、漢、港、粵等的工作幹部人員，一向是在危險恐懼之中生活，一旦進入「蘇區」，生命有了保障，生活便自然而然的在平靜之餘而趨向放浪。上級幹部間，派別分歧，如陳紹禹，秦邦憲之留俄派，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之舊中央派，彼此既有主張，而且各派各支之中，意見也極不一致，如留俄的楊尚崑——同情於舊中央派的做法，而同一舊中央派的張國燾，則頗不滿於毛澤東當時的作風。加以中下級幹部的互相批評互相指摘，遂使士氣日益低落，工作日漸鬆弛。

民國二十三年，「全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時，毛澤東先生便見到了這三種危機的潛伏，在大會裏作了一個極冗長的報告，反復的促起大家檢討過去的錯誤和努力打開此後的僵局。但是，時間是一個最無情的送葬者，在「蘇區」的政治經濟情形都還沒有

改善的常見，國軍的第五次圍剿便又緊接着開始，以至於由中共中央不得不被迫西竄，放棄了死守贛南的計劃。

二：「長征」的準備工作

國軍第五次圍剿開始的期間，中共便已經決定了不再死守江西的計劃。二十三年冬，王明更發表了一本「新條件與新策略」的小冊子，說明了紅軍不再死守江西的理由，和實行游擊戰爭的策略，以適應新的局勢。中共西竄的行動，在這時才明白的顯示出來。但是，中共西竄的準備，却在國軍克復廣州以後，便祕密的在分頭進行中。

中共的西竄，事先是有相當的準備的。

遠在「一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共的「蘇維埃政府」便在二十一年二月向日本「正式宣戰」，緊接着中共又發表了一個號召中國各軍組織聯合戰線，以與日本帝國主義抗戰的宣言。二十二年閏變期間，「蘇維埃政府」又宣佈在三種條件之下，可以跟國軍任何軍隊合作

抗日，這三種條件是：「一、停止內戰，停止對蘇維埃及紅軍的攻擊。二、保障羣衆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三、實行武裝人民對日抗戰。」在當時，這不過是對於政府的一個攻勢而已，等到西竄準備開始，抗日的口號便又被利用起來。方志敏在二十三年七月底首先率領第七軍向閩浙流竄時，便打起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但是，這支隊伍，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北上，他由江西一度進抵福州附近，在福建境內轉了一個圈子之後，就又很快的折向東北，竄進浙江，與福寧，福鼎一帶原有的「地方游擊隊」聯繫起來，攻陷了開化、慶元、常山、玉山等縣，再和閩贛皖邊的紅十軍取得了聯繫，無目的的到處流竄着，以減少國軍對於贛南、蘇區的壓力。同時，蕭克所率第六軍團，遂趁着國軍忙於調兵追捕這枝「北上紅軍先遣抗日隊」的期間，開始突圍西竄了。

在二十三年八月中，蕭克從贛南衝破了國軍的包圍線，跑進了湖南的南部，一路上像夢游病患者一樣在祖國的地圖上夢游着。一路由汝城、桂東、桂陽、新田、道縣等地，夢游過廣西的全州與貴州而到達了烏江邊境，又爲了被阻於國軍而不得不折回湘黔川三省的

邊界。另一路由道縣夢游到湘黔邊境。才不期而遇的撞到了在當地行動的賀龍的「第二軍團」，找到了他的夢境。但是，桂湘黔川等地，凡是曾經蕭克夢游過的地區，則都已十室九空，打穿了一條聯繫川、黔、湘、贛的曲線的孔道。中共此時看出了西竄的機會，業已造成，便一面命令盤據在川西徐向前所率的「第四方面軍」開關川、陝、甘的交通路線，一面積極的作西竄的本身準備。

中共中央本身西竄時的佈置也是相當的週密的。

第一、關於行軍方面，當時決定以「第一軍團」爲先鋒，以「三九軍團」走中路，以「第十三師」爲後衛，抵撐尾追的國軍，以「游擊隊」爲左右兩翼，分別呼應，而以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張問天，林白渠，王稼穡，羅遠，潘漢年，鄧發等及女子宣傳隊與黨政人員夾在主力之間，緩緩行進。朱德、劉伯承、林彪等紅軍將領，則分別担任着各路的行軍指揮。這一種祕密的行軍準備。本來是相當鞏固的，但是，不料爲了到處遭受國軍的阻擊，以至於不得不在川、康、黔、滇、湘、桂之間來往流竄，因而跑了二萬五千多里。

的冤枉路程，遂使得這一枝龐大的紅軍行列分得五零四散。由贛南出發時，號稱紅軍十萬，倒的確是有多無少，等到踏進了陝北以後，除去中共中央的要人和紅軍的高級將領以外，所剩的最多也不過僅有二三萬人了。

第二關於贛南「蘇區」的處置問題，中共當局除了派定了留守江西的部隊以外，還一面以「江西軍區獨立」，二、游擊隊」據險扼守贛南，以阻止國軍的西進，一面更派了「由蘇中央」的兩位副主席瞿秋白和項英留在江西福建之間的荒山上，指揮着這些隊伍。但是，不久以後，據守贛南的紅軍次第的均被國軍肅清，項英逃到蘇皖邊境，瞿秋白即被國軍捕獲而槍決了。

瞿秋白被捕以後，情形是異常可笑的，他爲了求生慾的驅使，寫了一篇「多餘的話」，並自暴自棄的將自己罵了一頓。但是，這篇「多餘的話」並沒有救到他的生命，而且，也沒有被魯迅翁替他收進那部精裝的「海上述林」的遺作內。

第三，中共中央更爲了「長征」的主力部隊做了一個週密的準備：物質方面，一面在

出發以前，加速的製造了大批的軍用品以外，還採購了六十萬石食糧，據毛澤東印象記的作者史諾說，「這些食糧除了人民自動供給以外，都是向地主和紳士那裏沒收來的」。一面更集中了「蘇區」內所有的金銀，準備着沿途的應用。人力方面：則一面加緊吸收大量的青年壯丁，以擴大紅軍的實力，一面更將原有的「紅軍大學」，「步兵學校」，「軍事專門學校」，「衛生學校」，「通訊學校」裏正在受訓的紅軍幹部人員分配到各軍團中去，擔任起各個部門的工作。精神方面，除了少數的中共中央的要人和紅軍的幾位高級將領以外，誰也不知道究竟要開往何處。雖然有的猜測入川，有的猜測入閩，而「打進資產階級的白區，解放無產者，自由享受他們的財富」的號召，却鼓舞着每一個紅軍士兵的戰鬥情緒，使得向中共中央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雖然經過了無數的險境，而終於能夠到達了陝北。

三：別了「中國的莫斯科」

福建人民政府曇花一現之後，中共當局便看出了國軍第五次圍剿情形的嚴重，乃計劃固守廣昌、建寧，以保「蘇區」，當國軍北路進佔甘竹時，朱德、毛澤東、秦邦憲、周恩來等即組織了一個「前方委員會」，親赴頭陂，洛口督戰，結集兵力，圖在廣昌孤注一擲，不意長生橋之役，激戰三晝夜，據周恩來對史諾說，這一次的圍剿之中，紅軍死傷竟達五萬餘人，廣昌遂於二十三年四月被國軍收復。中共乃退而死守建寧，無奈紅軍所受的訓練，絕不適用於陣地對壘，以致五月間建寧又被國軍克復，至此，國軍的重大勝利已經震動了整個的贛南「蘇區」，中共當局方面在毛澤東、朱德、秦邦憲、周恩來的協商之下，決定了一「突圍」的計劃。當毛澤東先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席上，提出了「長征」的建議時，一部分中共中央的要員尚不免有些驚訝，而戰事的發展，確證明了惟有「突圍」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於是，中共當局便一面在增城縣屬之驛前與長汀縣屬之白依洋嶺建築工事，以緩阻國軍的前進外，一面使積極的着手於「長征」的準備。一直到九月底，驛前和白依洋嶺相繼入國軍的掌握，「蘇區」的屏障，遂自此全部消失。於是，毛澤東先

生遂不得不握別了這經營了十餘年的「中國莫斯科」，而於二十三年的十月十六日，從嶺南的銅鑼灣出發，踏上漫漫的長途，朝着那寂寞荒涼的西北平原走去。

四：中共爲什麼要走向陝北

中共準備開始突圍的期間，爲什麼一定要選定陝北這樣一個貧瘠的地區做爲目的地呢？據美國記者史諾說：「這個區域，他們正確地預計，可以對中日蘇三國直接的命運有着決定的任務，這一次技巧的具有宣傳意義的行軍必須把它看成一個燦爛的政治的戰略。」但是，領導着紅軍「長征」的毛澤東先生，自己却並沒有將「長征」看得這樣的神聖。

毛澤東先生自己曾經對大公報記者長江說，「不得已放棄江西以後，最初的目的地是湘西，并不敢預定說能够到達遙遠的西北來，先命蕭克去探路，只想從湘西憑藉賀龍倫長江的技術，從三峽區域，北過長江，再圖發展。誰知道追兵太緊，湘西不能立足，乃想圖貴州，貴州四面受敵，而且太窮，乃轉而想從四川西南轉入川西北之松潘一帶，暫駐以觀

形勢。土城一敗，逼得走雲南川邊。辛辛苦苦到了川西北，乃是蠻荒千里，不宜居人，且松潘要地，已入胡宗南之手，不得已始出甘肅陝北。」

根據這兩段記載看來，可以見到（一）中共之所以「長征」，除了在江西不能再留的三種壓力之外，并想到西北另尋發展，而西北方面，却祇有陝北一帶才有劉志丹高崗等所建立的「蘇區」。所以，在中共由贛南出發時，陝北祇是中共的一個理想目的地而已。

（二）中共之所以能到達陝北，連中共自己也認為祇是一種僥倖。當出發之初，中共當局誰也不敢保證一定能達到目的。不料爲了國軍的追剿太急，和地理上的關係，才使得中共的這支紅軍到處亂竄，僥倖的出了重圍。

毛澤東生先對范長江所說的話是非常坦白而真實的。「一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偉大，傾「偉大」在這種不知不覺中。

第二章 長征的開始和結束

「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本事，如果寫成一個劇本或是一篇傳奇的話，其變化與結局的悲慘應該非常的動人的。

一：爲什麼要走上「二萬五千里」？

從贛南到陝北，在當時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條是鐵道線，一條是公路線。

如果走鐵道線的話，可以從瑞金沿公路赴樟樹鎮，搭浙贛路車直抵湖南株州，再轉粵漢平漢通車經武昌漢口而達鄭州，鄭州改乘隴海車西行，十幾小時便可安抵西京，向北一轉，便可以踏進了陝北「蘇區」。

要是走公路線的話，事實上也並不怎樣的困難。由瑞金出發，有公路可抵贛州，由贛州北上，經遂川、泰和、吉安、新淦、豐城等縣，即達南昌。由南昌出湖北，經衡陽，大

冷、鄂城，可直抵武昌，由黃鶴樓前渡江入漢口市，西北行可抵應城，由應城經皂市稍轉向西南，便直達荊門縣屬的十里鋪，由十里鋪北轉，一直便到老河口，由老河口入豫經光化，彭縣抵南陽，由南陽西北行，經過鎮平、內鄉、商南、商縣、藍田等縣，便到了長安。由長安轉北，經三原耀縣、同官、宜君而達中部，經過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黃帝的陵寢後，便可以跨過洛川而抵鄜縣。從這裏起便已經進入陝北「蘇區」了，

沿鐵道線坐火車走，當然是既舒適而又便捷，從贛南到陝北，一兩星期便可到了。就是在公路上拿起兩隻腳來開正步走，最多也不過只要走上兩三個月。因為由贛南的瑞金沿公路數到陝北的鄜縣，頂多也不過四五百里，僅等於「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一個尾數。

但是，這兩條路上國軍都結集着重兵，使得紅軍不得不繞道而走。加以沿途各省地方部隊的襲擊，遂使紅軍的圈子越繞越大。一直繞了四川的大雪山，繞過了西康的大草原，才算是告一段落。「長征」的產生，不但是當時的紅軍做夢也不會想到，便是由中共中央決定西竄計劃的幾位主要人物，在離開贛南「蘇區」以前，也沒有想到這一走之後，竟然要

走上「二萬五千里」的途程，費去了一年多的時日，才能夠平安的走進陝北的「蘇區」。

「二萬五千里長征」，還是僅就紅軍主力「第一軍團」所走的單線行程計算的，如果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蕭克的第一第六軍團，徐向前的一第四方面軍的行程和紅軍主力「第一軍團」所走的回頭路加在一起，恐怕事實上可能超出「三萬五千里」而有餘。單以紅軍主力想從貴州逕入四川的一段時期來說，便從婁山關偷渡赤水河來往四次之多，終於無法通過，而不得不再渡烏江，折入西康。這一段冤枉路程，便在「二萬五千里」的數字中佔着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

按照正常的路程計算起來，紅軍所走的「二萬五千里」的長途，最低限度要有一半以上的冤枉消耗。在這一半以上的冤枉路上，冤枉的犧牲了一半以上的紅軍。但是，這些冤枉的路途與冤枉的犧牲，並不是沒有大代價的。最低限度的代價是終於完成了由贛南到陝北的理想，與中共幹部紅軍將領的絲毫沒有損失。

再進一步講，便因為紅軍所走的冤枉路多，才使得國軍無法追擊，無從攔阻。當時紅

軍所走的路線大部份都是「流線型」的，一處不通，馬上便再更換一處，竭力避免和國軍及各省的主力部隊照面，而專向各縣軍力薄弱的地區流竄。所以，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雖然經過了贛、閩、浙、湘、粵、桂、康、黔、川、滇、甘等省，却始終沒有侵略過任何一處的省垣。同時，以十萬之衆的紅軍主力而專找國軍兵力不會配到的地區亂闖，各縣的地方部隊，各保安隊警察之流，自然不能與之抗衡，以至於閃出了一條曲折複雜的孔道。如果中共當時不採取這樣一個專找冤枉路走，而按照一定的方式來直趨急進，也許再費上一年的時間也不能從贛南走進陝北。如果中共當時願意到紅軍在大雪山大草原中因飢餓寒冷而斃命的冤枉犧牲，而專走大道正面突圍，也許紅軍就根本衝不出重圍。

民國廿四年十月，紅軍便在這種避實就虛的「流線型」的道路中，走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途，而「長征」到了陝北。據中共當局向美記者史諾說：出發時的十萬紅軍，到達時已犧牲了五分之四。但是，這還是僅就紅軍的主力部隊而言，如果加上志敏、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與蕭克賀龍的「第二軍團」、「第六軍團」沿途的損失和徐向前的「第四方

「兩軍」在青海時幾乎全軍覆沒一計算來，當不少於十萬之數，至於沿途各縣地方保安團隊與紅軍作戰的傷亡，以及各地羣衆因戰事關係而遷移流亡的民間損失，那便無從估計了。

「二萬五千里長征」，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中，不但是一幕空前的悲劇，並且是一部極殘酷的罪行史。

二：「長征」在進行中

「長征」的經過路程，是富有神祕意味的「流線型」的。而且，紅軍所經過的地名，不但是在普通地圖上沒有辦法去找，就軍事郵政地圖裏，有時也無法尋覓。所以關於「長征」的記載，連中共自己的文獻中，也不能詳確無遺。但是，大概的經過情形，一直到現在為止，參加過「長征」的紅軍們，却仍能歷歷道來，有如天寶宮女問話前朝遺事般的不勝感慨系之。

由江西至貴州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紅軍分兵三路，由贛南銅鑼灣開始出發，十月二十一日，

一部紅軍衝入國軍在安遠、信豐間的第一道防線，看情形紅軍頗有入粵之勢。當國軍正回顧南雄韶關之間，紅軍主力却從崇義出南康大庾，直趨湘境，十一月三日，汝城，桂東守軍以寡衆懸殊，遂被紅軍侵略。湘省當局那時料定紅軍必沿宜彬線北上威脅衡陽，遂在宜彬線以北結集重兵防守，不料紅軍却避開湘省國軍主力，從湘邊經過城口文明司沿着騎田嶺極難走的山地，於十一月十六日攻陷了臨武，嘉禾寧遠二縣隨相繼失守。紅軍由這一條山路上一個月的行軍中，又恰巧碰上幾陣大雨，爲了要在泥途中趕走，不得不設法減輕行裝。除去從「蘇區」帶來的金銀及軍火不能亂丟之外，其他的笨重器具，各造幣廠的機器，印刷廠的機器等便祇好忍痛的拋棄了。等到何鍵察覺紅軍的西進，趕緊調派劉建緒薛岳等急趨零陵一帶阻擊時，才將紅軍衝成兩股，一股北上，於十一月廿三日攻陷道州，竄入桂境，另一股也經過永明突入廣西。當時這兩股軍力都集中於全州一帶，很可能去佔領興安威脅桂林，不料廣西的國軍又迎頭打來。使得紅軍不得不一面分兵一部折回永明，分出道縣、靈縣、產山等處，以阻湖南國軍的追擊，一面便以大部的主力部隊繞過國軍主力

防線，經過西延，重入湖南西南邊境。這時，湖南的國軍正結集在零陵，桂陽一帶，擊紅軍的後衛，遂使紅軍主力得以急急的穿過城步綏寧通道無縣進入黔邊。於十二月十四日攻陷黎平。分股佔錦屏永縣。紅軍在這一階段的危機，是間不容髮。

貴州「突圍」

黔省當局除了見到紅軍兩月來都是既在湘桂邊境流竄，根本上便不會想到紅軍會糊裏糊塗的插進貴州，以致黎平的紅軍主力，得以得到一個急急進軍的機會。紅軍於二十一日陷劍河，由岑松急進，二十六日陷施秉、黃平、鎮遠、青溪、玉屏等縣，遂相繼失守。當駐防烏江南岸的王家烈猶國材兩部，急急調至貴定，甕安一帶以保障貴陽時，紅軍卻從黃平急轉北上，於三十日攻佔餘慶。攻陷涪州、石阡、印江、思南等處，欲與川湘邊境的紅軍「第二六軍團」取得聯絡，不料湘黔國軍合力的圍剿，使得此路又告不通，乃拚出全力竄抵烏江南岸的袁家渡，幸而搶到了當地會民的幾隻皮船竹筏，才在二十四年一月四日渡了天險的烏江。

烏江北岸除了有一個江防司令部以外，別無重兵把守。紅軍因得於一月十七日陷涪潭，十三日陷遵義，十四日連陷婁山關及桐梓城。鳳泉、綏陽亦相繼失守。這時，紅軍爲了沿途遭受夾擊，一腔暴戾之氣，無處發洩，遂一面在涪潭、遵義、綏陽之間趕築工事，以阻追兵，一面分兵北上，荼毒人民，十七日陷松坎，轉而向西，二十二日陷溫水後，遂經涪水面抵赤水。在這一帶地區，無辜受害的死亡爲數不可估計。按當時的情勢，紅軍本想直入川西南，轉向川北，以與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會合，不料土城之役，紅軍全鋒彭德懷部，被川省國軍郭勛部隊打得太敗而逃，使得紅軍主力不得不改變初衷折向西南，經永寧、古蔺、建武，偷渡赤水河，而於二月十二日行抵威信。

紅軍主力部隊結集在威信以後，因見劉湘已派大軍堵斷合江、綦江一帶無法進展，乃於二月十九日重渡赤水河又行竄回黔境。二十六、二十七兩日乘虛取陷後餘灰的婁山關及遵義桐梓兩城。三月十七日紅軍攻陷茅台，并將仁懷攻陷，再渡赤水河，十九日因終始無隙可乘，乃又渡赤水河東返。在這一月之內，各地居民在紅軍光臨之先，本多已率家逃走，等

到紅軍被擊退竄以後，才又重回家安業，不料國軍剛才調走，紅軍又敗退回來，民衆因不及逃亡而被奪者，爲數頗多，這時，紅軍用掠來的民衆補充了隊伍，用各色的布疋，添製了各種式樣的服裝，當國軍結集川黔邊境，準備於紅軍入川時加以全力圍剿的當兒，紅軍突於三月三十一日又往回走，渡過烏江，直向貴陽前進。恰巧這時掠到一輛過路汽車，從中發現了一張很多重要的軍事地圖，窺實了黔滇兩省的軍事配備情況，遂在貴陽以外二百里處的白馬湖繞過貴陽，向西急進，四月十日陷定番，經廣順、紫雲、定寨、城風於十七日渡過北盤江，經過屯腳豬場進抵滇境。

掠過雲南

紅軍進抵滇邊之後，本應直趨川北，但因滇省當局在滇東已有準備，故不得不偷渡金沙江而入西康。當時，又恐直趨金沙江會被滇省國軍所阻，遂一面分兵佯攻昆明，於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經馬龍城攻陷嵩明，掠了四十多匹騾子所能馱動的金銀，一面讓主力經

過搖區，逕趨西北，「補募」了一萬多個紅軍新戰士。由於在貴州所奪獲的那張軍用地圖的指示，紅軍早已知道了滇境國軍的分佈地和可以渡過金沙江的渡口，甚至於何處渡船最多何處渡船最少，那張地圖上也都記有符號，於是，紅軍便於五月四日分途結集在五渡河直趨龍街渡口，五月八日，紅軍便僥天之倖的渡過了金沙江。

竄進西康

紅軍由金沙江岸出發，爬過了一座四十多里草木不生的荒山，在五月九日晚間，侵據了通安街道。十日紅軍主力部隊已全部到達通安集中，遂開始進攻會理，不料國軍劉元璋部防守週密，使得紅軍不得不繞城而過。這時，紅軍爲了湘桂一帶與追兵作戰的犧牲過大，而在沿途如貴州雲南所「補募」的新軍，却祇能補償在各該補募地區的損失，所以急急的要北上，以圖進入川邊，與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同時，又恐會理國軍劉元璋跟踪追擊，防害路程，遂一面分兵一部經西昌，越雋，到大樹堡佯裝搶渡，進窺富林；

一面却以主力偷過西昌、瀘沽，走過冕寧的贊區，而於五月二十六日到達安順場。

紅軍主力到達安順場以後，一面尋得渡口，派兵一師，渡過大渡河，以十倍的軍力擊敗了北岸上楊森的一營守軍，一面集中兵力與南岸的一師人夾河而上，在三十日到達瀘定橋。當時南岸守橋的國軍僅有一旅，在腹背受敵寡眾懸殊的情形下，遂不得不自動退却。

紅軍奪得瀘定橋後，一面派兵沿大金川北上，經丹巴、道孚、甘孜而至德格，再沿金沙江南下至巴塘裏塘折回丹巴，以擾亂追兵的目標。一面分主力爲兩路，一路於六月八日經始陽攻陷蘆山，一路於十二日經天全攻陷寶興。這兩路主力與丹巴的後衛集齊以後，便急向川邊趨進，於十六日全都到了懋功。

退入川北

二十四年六月十六日，紅軍「第一軍團」在大雨滂沱中走到懋功，會着了徐向前的一「紅四方面軍」，這時追兵已遠，而川北國軍的包圍線也尙未完成。遂給了紅軍一個喘息的一

機會。一直到一星期後，紅軍主力部隊已經全部到達懋功、八角一帶時，才在六月廿三日開始出發，向着國軍尚未配備得到的地區北進，經撫邊、兩河口而於二十七日到達卓克基。卓克基僅有一位土司索觀瀛，曾經在成都受過高等教育，但是，他們的軍事力量，却是薄弱得可憐的。所以當紅軍大股開到之後，便不敢抵抗逃進深山去了。

這時，由江西出發的十萬紅軍，除了在湘桂線阻擊追兵犧牲了三分之一以外，因為一路蹣跚於饑餓線上，死亡也頗不少。雖然在哈漢一帶增加「補充」，而到達川邊時最多也不過僅剩了四五萬人。懋功境內的一星期休息中，「紅四方面軍」的四五萬人漸漸的和「長征」的紅軍主力集合了，紅軍的聲勢，因此才重行振作起來。當時川北境內，除了土人以外，國軍尚未佈防，遂使得這兩股合流的十萬紅軍，得以一面在松潘境內緩緩的進行，一面積極的整頓軍械行裝糧食，以做北上的準備。

紅軍六月廿九日離開卓克基，於七月十日行抵毛兒蓋。從此以後，便一直在黑水河一帶，轉着圈子，到八月二十三日，放足了六十萬斤麥子，和幾百隻牛羊以後方從毛兒蓋動

身，以四天的時間走過了大草地，於八月二十八日行抵巴西。在巴西又休息了五天，九月二日，到毛龍，在毛龍休息兩天，進抵俄界，在俄界休息了一星期後，除了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已經轉向川北，阻截胡宗南由松潘北上的追兵去了。僅剩下的「長征」紅軍的四五萬主力部隊，便從崑江以北轉進白龍江上游的大山中，奔向甘省邊境。

由甘肅走到陝西

紅軍進抵甘肅省邊境之後，九月十五日侵略石門，捉到幾個甘肅省的國軍，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了拉子口的天險不過祇有兩班守兵，而且橋也未會拆除，於是便急向懸窩進發，以全力迅速的侵略拉子口，國軍魯大昌部的一旅人爲了衆寡懸殊，不得不回衛蘭州，九月二十日，紅軍遂經懸窩，鹿元里，而達哈遠鋪。

當時，甘肅省當局，原以拉子口有險可守，沒有料到紅軍在石門就問清了拉子口的軍事情況，五天之內，便近臨潭。等到甘省國軍由臨夏一帶急起阻擊時，紅軍已由哈遠鎮折

向東北，經新市，榜羅，於二十九日陷通渭，越固原，急轉陝北。當時由川北出發的五萬部隊，除去大雪山，大草原中死亡萬餘以外，此時所剩的紅軍，最多也不過三萬餘人了，剛剛抵住甘省國軍的追擊，而寧夏的國軍又從側面圍上來，正在紅軍兵疲力竭之間，幸逢徐海東劉志丹的「西北紅軍」從陝南竄出，同時，蕭克賀龍的「第二六軍團」和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也分途到達西北，使得甘、寧、青的國軍不得不回頭後顧，於是，「長征」紅軍的主力，才行經環縣，三岔，洪德進入陝西，於民國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到達了洛河上游陝北「蘇區」的吳起鎮，走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途。當時檢點人數，除了中共要人及紅軍的高級將領絲毫沒有損失以外，由江西出發時的十萬紅軍，到達陝北時已經僅剩下兩萬多人了。

三：「長征」插曲

茅台酒濯足

紅軍先鋒部隊階進茅台後，有一部份部隊駐進了一家名叫「義成老燒坊」的釀酒作坊。這家釀酒作坊的房屋是一座很漂亮的「西式洋房」，住宅的後院裏排列着無數的水缸，每缸內都滿貯澄碧的清水。開始發現這些水缸的一些「紅色戰士」，不知是走了太多的路疲乏得不願多動的關係，還是早已養成了這種「就地取材」的習慣，他們竟然都並坐在缸沿上就在缸內的清水中洗起腳來；不料缸內的清水經過一度攪動之後，竟然發出一陣芬芳撲鼻的酒味，他們才知道這些缸內的清水都是些真正的好「茅台」，可惜數缸美酒已化做洗腳泥湯，這事一傳開來，駐在附近的部隊，使大家不約而同跑到這家「義成老燒坊」來大喝其酒。紅軍蘇籍顧問李德，宿性嗜酒如命，一聽到這一喜訊，馬上便邀同了幾位中共要人，紅軍將領跑進了酒坊，就缸痛飲，一直到醉倒缸邊才後拔而出。離開茅台時，這些紅軍的行軍水壺中都裝滿了不少的佳釀。後到茅台的部隊除去絕對不會飲酒者以外，幾乎無不前往「義成老燒坊」一嚐名聞寰球的「茅台」。一直到紅軍後衛部隊趕到茅台，連那缸洗腳水也全都喝得涓滴不剩了。

偷渡兩條江

烏江南岸之間，相距約二百餘米。當一月二日紅軍先頭部隊趨到江邊，黔省國軍早已將船隻全部拘走，當這些「紅色戰士」正兀立江干無法可想時，幸而主力部隊陸續趕來，帶來了幾隻苗民渡江所用的皮船，可作少數兵員渡江之用。於是紅軍「第一軍團」的指揮員劉伯誠便想了一個辦法，一面先用皮船分批渡過一部兵力，趕走了幾個極少的江防守兵；一面便編竹爲筏，渡過了主力部隊。

紅軍這次搶渡烏江，事實上是相當的幸運的。設若黔省國軍不是以爲天險可恃，疏於防守，而在烏江北岸配備上一旅左右的兵力，則劉伯誠縱然能不惜以人爲橋，也勢必無法越過這烏江的天險。

紅軍土城戰敗，由四川重慶赤水轉回遵義，國軍多半以爲紅軍將趨川湘邊境與賀龍蕭克的第一二六軍團會師，遂在黔省東北結集大軍以待。不料紅軍却再渡烏江，折向

境。當紅軍第二次渡過烏江時，便不再像第一次那樣困難了；這回渡江，一方面因為紅軍已經有了經驗，一方面因為國軍沒有想到紅軍會往回走，而根本未加防備，使得一部紅軍能夠作筏渡到南岸，從容的架起一座鐵索橋來，把主力軍接了過去。

紅軍掠渡金沙江，經過也是非常有趣的，金沙江的水面，雖然不寬，而水勢的奔騰，却遠非烏江可比，各渡口渡江的船隻不但已被國軍拘往北岸，而沿岸數十里路全是砂石地區，草木不生，無法架橋西渡。當紅軍在貴陽附近，截到了一張軍事地圖以後，對於金沙江所有的渡口和國軍兵力，都已瞭如指掌，遂一面趨向守軍最少也最難渡江的渡口蘭開伴作尋竹編筏，以轉移其他渡口守軍的注意，一面派出一部份主力部隊改裝國軍潛行撲至周平寨渡，繳了守軍一營的槍械，迫令被俘軍官，借口有一部份國軍追擊紅軍到此，到江邊喊對岸的守軍放過幾條船來，將他們渡過江去，對岸因為確是自己的部隊在喊，遂毫不疑心放過來幾隻小船，於是這些偽裝的「國軍」便拚命的擠上船隻，渡到北岸，出其不意的將北岸佔領，這時，結集關開的紅軍，已全部飛速的趕到，一部部的渡過江去。

當紅軍到達周平塞渡江時，因為船少人多，又懼國軍從背面追來，故不得不日夜擺渡，一隻船常常載了超出容量一半以上的人物，而船又要拖曳馬匹涉水過江，以致行抵中流每每不慎翻船，人畜傷亡，不計其數。當紅軍乘船渡江時，頗得力於船夫之助，因為紅軍有的是鴉片和金銀，所以船夫都肯拚命，一直到紅軍渡完之後，這些生長在滇省的鴉片煙鬼的船夫，頗有不少因為緬念紅軍之擁有大量的「雲膏」。而隨了紅軍走向陝北。

裸裸國的女皇

西康冕寧有一片專門劫掠漢人的蠻區，本地人都稱為「狸裸國」。裸裸有白骨頭和黑骨頭之別；黑骨頭是主人，是土生的貴族，而白骨頭則多是奴隸，是黑骨頭所掠得的漢人。紅軍爲了要避開國軍主力趨向四川，不得不經裸裸所居的區域。但是，裸裸對於漢人是異常仇視的，而裸裸的勇敢善戰又爲紅軍所深知，於是，紅軍當局在這時遂特令各部隊的政治指導員將軍心加以激勵。在紅軍中馬上便流行起來兩個口號：一個是「踏平資產階

級的猓猓國，解放被壓迫的白骨頭」。一個是「打倒黑骨頭資本家，平均分配他們的財富」。紅軍的士氣，大大的振作起來，黑骨頭山洞裏所藏的金銀，光閃閃的在紅軍的戰士們眼前發亮。

在一個午夜裏，大隊的紅軍向着「猓猓國」進軍了，越過一重山又是一重山，沒有燈光，也沒有房屋，到處是嶙峋的石岩，到處是黑越越的一片。突然，遠處響起了一陣疏疏落落的槍聲，也不知究竟是來自何方，緊接着一片中彈跌落的音響，夾雜着無力的呻吟和沉鬱的叫號，把一座深夜的荒山，擾亂得更加異常悽厲。一直到天明集合，沿路上到處是紅軍的尸身，黑骨頭早已不見。橫在紅軍面前的，依舊是一座座荒涼的山頭，一塊塊嶙峋的岩石。於是，紅軍停止進攻了。第二天，紅軍和黑骨頭講了和，訂立了假道過境的協定。

紅軍和「猓猓國」的黑骨頭訂定假道過境協定的條件，是由劉伯誠代表紅軍，向猓猓國黑骨頭的女皇行三拜九叩的大禮賠罪，并由紅軍送給女皇兩百隻步槍和一千元^多的銀幣。

當時紅軍的政治指導員又告訴一些戰士們：「紅軍已經和猓猓停戰了，過境時不准佔

雜糧的房屋，和糧糧交易一定要用現金現銀，不得參用紙幣」而停戰的理由則是：「因為「猥猥國」的黑骨頭資本家，本來也是實行無產階級的戰鬥任務的，他們雖然有比着紅軍還要多到若干倍的現銀現金，但是，那都是從那些由「猥猥國」經過的資產階級的富商買辦沒收而來；和紅軍的行動並無二致，也可以說，紅軍與「猥猥國」的黑骨頭全是執行同一任務的同志。以前不幸發生誤會，現在已完全解除了，今後紅軍對於「猥猥國」的黑骨頭應該作爲戰友一樣看待。至於那些白骨頭，以前既然全是資產階級，當然不合紅軍解放他們的標準，無產階級的紅軍不得因此而延誤了自己的前途和任務」。於是紅軍默默的出發了，在猥猥境內走了一天，兩岸圍觀的羣衆裏，有不少黑骨頭戴着釘有紅星符號的血跡斑斑的紅軍的軍帽。

搶過瀘定橋

大渡河是一個歷史上有名的險地。相傳三國時諸葛武侯五月渡瀘的瀘水便是此處，而「勒馬渡懸崖，灣弓射明月」的石達開，也就是在這裏兵敗糧絕而遁逸了他的踪跡。但是

這樣的噩運，却沒有光顧紅軍，在林彪率領紅軍「第一軍團」到達安順場時，當地一位團總竟然還留了一隻船靠在南岸，作萬一的準備，不料紅軍來快了一步。連人帶船一起作了紅軍的俘虜。紅軍得了這隻船以後，便搜尋了十二個富有經驗的船伕，一批批的將紅軍載過對岸。當時，北岸僅有國軍楊森的一營部隊，在南岸紅軍密集的機關槍掃射下，當然無法抬頭，以至一批批的紅軍都安全的渡到北岸進入了山下的死角，這樣一直渡上了大批紅軍搶上山頭之後，國軍因兵力過於薄弱，遂不得不退出陣地。紅軍這時雖然佔領了南北兩岸，但是，因為船隻太少，如果要將全部紅軍渡完，一定還要費去相當的時日，同時，國軍業已發現紅軍在此渡河的企圖，正從後追來，絕對沒有慢慢渡河的可能，於是，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趕到之後，便決定先以一師人渡過大渡河前進，其餘的部隊則夾河而上，分兩岸直趨瀘定橋。

瀘定橋頭，當時僅有國軍一旅，橋上木板雖已拆除，而鐵鍊則並未破壞。紅軍遂一面選出一部沿途掠來的伏役，迫着他們沿着鐵索向前爬行，用以阻止對岸國軍的子彈，一面

便續派部隊攻板橋，節節逼近，正在這以人民血肉換取紅軍通道的當兒，恰好對岸的一師紅軍已經行近橋東，使得守橋的一旅國軍腹背受敵，不得不向後撤退，南岸的紅軍遂趁勢在鉄索上鋪好木板，讓主力部隊全數渡過橋東。但是，那些伙子却早已葬身江流了。

川北過番區

紅軍到達川北以後，第一個最大的困難，便是又遇到了西番土人。這些西番，根本上便不懂得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而且絕不讓紅軍能有解釋「少數民族政策」是一回怎樣的把戲的機會，他們對於紅軍的抵抗，第一步確實的做到了堅壁清野的工作，第二步便時時出其不意的對紅軍來一下「游擊」，當時紅軍有的是大塊的金銀，但是却找不出一家出售食物的商店；紅軍有的是槍械子彈，但是却找不到一個可以射擊的敵人。西番的氣候地理，又與其他各地不同，不是一片片的古木蒼松聳入雲際的森林，便是急流高山和泥濘的小路，不是碰上常年不散的雲霧，便是遇見紛飛的雨雪，紅軍掙扎在寒冷饑餓之中，本

已疲憊不堪，死亡載道了，而西番的土人又隱藏在紅軍必經的小路叢林附近，不時的對準人畜推下一塊塊大石頭來，使得這一大隊的紅軍，竟然無用武之地。有時，少數的紅軍受不住飢寒的壓迫，潛行到道旁去尋找羊隻，一去之後，便永遠不再回來。

在卓克基到毛兒蓋途中，紅軍的左翼，便因為遭遇了西番騎兵的阻擊，犧牲了不少的戰士，不得不折回右路，不意走到馬河壩附近的一所小村上，竟然沒有一點人煙，這支紅軍，本來已經斷絕糧精四天，這時仍然找不到一點食物，遂不得不停止進行，發電呼籲，等到主力部隊收到電報急派輸送隊攜帶糧食赴援時，餓死凍死的紅軍已過三分之一。

因此紅軍到毛兒蓋波羅子之間，便趕緊籌辦倉糧，以備急需。

波羅子一帶是比較富庶的區地，紅軍便在那裏開始了籌糧工作。當時，番民所種的麥子業已將熟，紅軍便全部動員將這些麥子割下「帶走」。

人間奈何橋

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最悲慘的一幕，實莫過在大雪山與大草地中所受的天然障礙。這兩個地方真是人間的奈何橋。中共爲了要通過這兩個地方去尋求理想的天國，却不知道凝固了多少紅軍戰士的血液，才將這兩個地區鋪成一條骨肉的坦途。

大雪山橫亘在黑水河流域一帶的山頂上終年積雪，杳無人烟，空氣稀薄，風、雨、雪，毫無常態。紅軍走上大雪山時，因爲正在六月，多半都還穿着相當單薄的衣裳，要想走快，空氣簡直不够呼吸，稍微走慢一點，傍晚便風雪交加，淋得一身透溼，這些來自東南的紅軍，大部份都沒有見過這樣的氣候，腿一軟不是滑倒在冰上不再站起，便是陷入泥中，永遠無法上來。加以走過則格蘆花等地的黑水河邊，水流湍急有如萬馬奔騰而無法渡涉，兩旁的羊腸鳥徑，又非緊逼峭壁不敢通過，紅軍前部的死亡，幾達一軍團的三分之二。牲畜墮下危崖者，更是不計其數。

紅軍由毛兒蓋出發以後，不兩天，便在眼前現出一帶平地，但是，下了分水嶺，一走進去，才知道這些草地簡直是等於池沼。天空上幾乎成天的都像在下雨，地面上僅有的一

條可以勉強插足的鳥徑，只有土人嚮導才能找得出來，稍不留心掉下了泥潭，便會愈陷愈深，無法挽救。走起來簡直比爬上高山還要費力。當時的紅軍，頭上既然沒有雨具，足下也都沒有馬靴，幾乎無不全身溼透。夜間又不敢行軍，便只好互相抱扶着在灌木下面稍避一下露雨，加以瘧蚊四出，紅軍死亡頗爲深重，四天之後，一部份走出了草地的紅軍，也多半是一身泥漿，狼狽疲乏交織的無法再走。因此，紅軍過了草地以後，就不得不在巴西停留下來。

紅軍在草地行進中，因爲週圍找不到一點乾柴，無法舉火煮飯，四天來，祇好只吃生米生菜，因而病倒頗多，這時，病與死幾乎沒有分別，誰病了誰就得死；無論是長官、部下、朋友、親戚，誰也不會顧誰，人類本是一種最自私的動物，在這環境裏，尤其是平時更加暴露得明白。凡是經過大草地的紅軍們，大都相信了一句話，那句話便是「人吃人，是可能的」！

三十女戰士

在紅軍走過大雪山與大草原這些人間的奈何橋時，中共要人與紅軍將領們，因為走在後面，所受的困難當然不會太多。連那些和中共要人們紅軍將領們在一道前進的婦女們，據李大釗說，由江西走進陝西，三十個人一個也不會缺少。李大釗並列舉出三十個女戰士的芳名，作為沒有損失的證明。但是，這三十位女戰士在江西出發時，便已經都是些知名之士，現在，則更都成了中共的婦女要人。在這三十位女英雄以外，也許還有從江西同紅軍一道西行的婦女，至於這些無名的女英雄是不是也安全的到達陝北，却至今還沒有任何人能夠知道。李大釗所舉的那三十位女戰士的芳名是：賀志健（毛澤東夫人）——那時毛先生還沒有和蓋蘋結婚，康克清（朱德夫人）、李大釗（楊尙坤夫人）、劉英（張聞天夫人）、陳慧清（鄧發夫人）、劉羣仙（秦邦憲夫人）、周月華、廖月華、阿香、吳胡蓮、王乾元、吳仲蓮、彭六英、謝小眉、李小江、李建貞（董仲山夫人）、丘一涵、李建華、危拱之（葉劍英夫人）、危秀英、廖施光（何克金夫人）、錢希鈞、韓世英、金維映、蔡暢（李富春夫人）、鍾玉林、劉彩香、鄭玉、楊厚增、鄧穎超（周恩來夫人）。

第三章 到了陝北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贛南出發，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終於踏進了陝北。名爲「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中共最高權力機關，也在延安正式組織成立。從此以後，中共的生命史，便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從二十四年到七七抗戰爆發的兩年中，中共作風轉變的速度是超出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的。在「蘇區」的作風方面，中共剛到陝北的時間，還雷厲風行的實施一貫的「土地政策」，不久之後，不但自動的停止沒收土地，並且還向地主保證雇農交息交租了。在中共黨內方面：張國燾在中共初到陝北時，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抗戰開始不久，張國燾竟然跑到西安，公開的發表了一個脫黨的宣言。在對外作風方面，中共「十二月黨的決議」裏還大罵政府，而「八一」宣言中却又倡言爲了抗日願意擁護中央了，在軍事行動方面，二

十五年二月裏還渡河侵入山西，一轉眼間，便又提出了「統一陣線」的口號。中共的這種急劇的轉變，固然是一種「進步」；但是，促動中共這種「進步」的原因，却另外有着種種不同的力量在。

一：「團結」露曙光，中共宣言「共赴國難」

中共自紅軍由陝北渡黃河進擊山西未遂，漸漸的已經感到了一種日暮途窮的悲哀。這時適逢其會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決議「在反帝人民戰線的策略要求之下，中國共產黨必當將擴大蘇維埃運動與中國正在發展的民族革命運動連結起來」。於是，中共乃乘此良機，倡言抗日，發表「八一宣言」，以爭取全國人士的同情，並企圖能對紅軍盛處西北一隅的環境有所改善。「雙十二」事變以後，更給了中共實現此項目的的一個絕好良機。在「國防文學」繼「普羅列特利亞文學」被「八一宣言」判處了死刑而風湧渥上之後，「延安」兩字，才漸漸的引起一部份國人的注意。但是，當時爲了中共的倡導的抗日手段如「

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建立「民主共和國」等，仍不能爲一般國人所同意，故所得效果，依然未能盡如中共理想。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中，通過了「根絕赤禍」的決議案，允許中共在嚴守軍令政令，不作「赤化」宣傳活動的情況下，可以輸誠受命。這時，適逢第三國際的代表畢特羅斯偕同中共派駐第三國際代表陳紹禹由莫斯科飛抵延安不久，同時，畢陳二氏並帶了一件第三國際的密令，對中共的政策作了四項指示：這四項指示的內容大概是：

一、中共應以事實證明，使政府信任「聯合抗日戰線」的誠意。

二、中共應直接向英美說明「聯合抗日戰線」的意義，以減少壓力並進而爭取同情。

三、中共應向政府保證，在抗日戰線上可以考慮蘇維埃政府名義的存廢問題，但，不能損及紅軍的獨立存在；中共並且要在蘇區儘量擴大紅軍。

四、中國民衆現未能接受共產黨之領導，中共今後在綏、甘、寧、青、新等省內建八

民戰線，以與政府妥協。對外政治活動，應靈活運用「民主」「團結」口號。

因此，中共遂在「八一三」事變之後的四十天，正式宣佈了「共赴國難宣言」，由「打倒政府抗日」，「迫使政府抗日」，「聯合政府抗日」，一變而為「擁護政府抗日」了。中共自己對於此項急劇的轉變的解釋是一切爲了「抗日」，一切爲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中共在「共赴國難宣言」中，並提出了四項保證：

-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的政策。
-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中共提出了這四項諾言之後，蔣委員長當即於二十四日發表談話，准許中共輸誠受

命，努力抗日。同時，舉國上下亦莫不盛讚中共深明大義，勇於改過自新。可以說，在中共有一「史」以來，當以這一段時間最爲光彩。——雖然，中共後來對於自己的諾言，並沒有一貫真正的履行實施。

中共這一個急劇的轉變，實質不管是變得如何或者是根本上便不會變過，但是在形式上看來，總不能不說是中共作風的一個「進步」，當時促成這種進步的主因，大概不外乎下列四項。

一、由於德、意、日、「侵略陣線」的形成，蘇聯已陷入了「反共協定」的包圍。日本侵略中國的積極，當時很可能發展爲對於蘇聯的進攻。第三國際爲了要假手中國以削弱「防共協定」簽字國之一的日本的實力，故不得不命令中共表面上暫時放棄一貫的政策，以促成中國的統一，使中國政府能够肯於而且敢於對日作戰。

二、由於七七事變以後，國難的日趨嚴重，展開保衛民族的戰爭，已爲一般國人心中最高的理想，階級鬭爭的對內口號，已經失却了作用，同時，中共如果仍然繼續以往的

政策，徒耗國力，則勢將召致國人之唾棄與不滿，而永久無法在人民心中再建起任何信仰

三、由於陝北之地瘠民貧，非對外發展無以立足。而當時的紅軍剛剛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元氣已損失殆盡，勢難再與國軍抗衡，加以「雙十二」事變以後，中共已經看到蔣委員長已經確實成爲民族的偉大領袖，任何危害領袖的全國都將爲國人所不容，故不得不在爭取國人的同情下再圖發展。

二：良辰易逝，「統一」類曇花

共赴國難宣言發表了以後，雖然「中國共產黨」依然是「中國共產黨」，而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下的「紅軍」，却已經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陝北「蘇區政府」，也當真的改換了「陝甘寧邊區」的招牌。在這一階段裏，中共爭取國人同情的目的是達到了一部份的，但是，這種「團結」的情形，僅僅維持了一年之久，便一天天的又趨惡化；一直到二十九年年底，三十年春初，惡化的程度，簡直已到了爆炸的階段，於是，

中共問題遂又成爲「問題」，報紙上有關「中共問題」的記載，又亂針般的刺進了每個同胞的內心。

中兵問題之所以又成「問題」，其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是由於中共「黨的策略路線」未能符合政府抗戰的要求，至於「問題」的形成，却並不是中共的「黨」的本身，而可以說是由於在中共「黨」的領導下的「軍」「政」當局。

由紅軍的改編到「新四軍」事件

中共由贛南竄抵陝北之後，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的洗刷，所剩不過兩萬餘人。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時，經政府明令規定，編爲「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爲總司令，彭德懷爲副總司令，二十六年秋「第八路軍」已募足四萬五千人，編成三個師，政府對於「第八路軍」的補給待遇亦與其他國軍相同。劃歸第二戰區戰鬪行列，受閻錫山長官指揮。朱德以「第八路軍」整訓未久，不能担任正面之正規戰鬪，當即請准政府在晉北地區担任對敵游

擊牽制活動。同時，散處在贛閩皖鄂的紅軍傅秋濤，馬俊高，劉英，陳毅等部，亦經政府改編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項英爲正副軍長，並發給與國軍相同之待遇補給。到了二十九年一月，「新編第四軍」已募足一萬三千人左右，成立四個支隊，劃歸第三戰區戰鬥行列，歸顧祝同長官指揮，並指定在江南蕪湖一帶担任游擊。這是「第八路軍」與「新四軍」改編的經過，從這時起，「第八路軍」（旋改爲第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的編制迭有增加，十八集團軍擴編爲三個軍六個師五個補充團，（師之編制爲整理師，兩旅四團制。）「新四軍」亦由四個支隊擴編爲兩個整理師。十八集團軍的總司令朱德，並担任了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職務，負責指揮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的十八集團軍，政府並將紅軍改編的「新編第四軍」調赴第二戰區，劃歸朱副長官指揮。同時，政府又明令規定冀察兩省主席由政府遴選任命外，朱副長官得保薦省府委員三人至五人。政府的這種措施，一般的說來，似乎只是爲了作戰關係，而實際情形，則是爲了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與友軍之間衝突，已經到達了惡劣不堪的程度。

第二戰區閻錫山司令長官，在太原失守時，便積極從事訓練新軍，以作反攻準備，不料十八集團軍劃歸第二戰區戰鬪行列以後，新軍便漸漸的受了中共的政治薰染，終於二十八年十二月新軍在十八集團軍的掩護下，由韓鈞率衆叛變。致使第二戰區的反攻計劃，無由實現。從這時開始，十八集團軍襲擊友軍的行爲，政府便常常的接得報告。十八集團軍第一二零師三五九旅王震部，亦於廿八年由前線開回陝北，更於二十九年四月，以武力驅走陝西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佔領了綏德，米脂，清澗，吳堡，蕪縣等五縣。第八戰區爲了防止何紹南事件的繼續擴大，遂於二十九年十月，在陝北設立了一個掩護地帶。

「新四軍」自奉令編成以後，即始終未在指定地區作戰，往往自由活動。政府因迭接第三戰區，關於「新四軍」與友軍發生衝突事件的報告，乃由何參謀總長應欽與白副參謀總長崇禧於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以皓電致朱副長官，限新四軍全部於電到一個月內開赴黃河以北作戰。國內輿論界如大公報等，亦紛紛著論，以軍令必須統一相詰誡，旋以「新四軍」迄未遵令調動。同年十二月八日，何總長白副總長，復以齊電督促，蔣委員長亦一

得乎令「新四軍」展限北移，不意「新四軍」仍舊一意流竄，終於三十年一月十三日因襲擊國軍第四十師而受了顧祝同長官的緊急制裁，下令撤銷「新四軍」的番號，將「新四軍」全部解散，軍長葉挺送交軍法審訊。一月二十日，中共竟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收輯新四軍的叛變官兵，仍舊襲用「新四軍」的名稱在江南各處流竄，並發佈了一個「特任陳毅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爲副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民國三十年春，「新四軍」因不聽調遣並又襲擊友軍，被政府明令解散以後，十八集團軍亦因抗命不開赴政府指定作戰地區而同時受了停發軍餉的處分。從此以後，全國人士所企求的軍令統一的夢幻，遂曇花一現般的化成泡影。

「邊區」的設立與「邊幣」的行使

民國二十六年，中共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以後，便自動的將原來的陝北「蘇區」

改名爲「特區」，旋又改稱「陝甘寧邊區」，後來便一直沿用着這一個名稱而不會再改。當時，政府明令發表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際，對於「陝甘寧邊區」的管
理問題，曾經有着一個擬議。擬議的內容共分六點：

「一、名稱：改爲行政督察專員區。

二、隸屬：陝西省政府。

三、政令：區內政令一律遵照中央現行法令辦理。

四、人員：區內專員縣長暫由十八集團軍保請政府任命。

五、駐軍：專員區發表後，十八集團軍在陝甘寧邊區內各留守部隊，一律撤至專員區
內。

六、區域：由中央規定。」

政府這一個擬議，中共當局並沒有接受，政府乃一再修改，制成『中央提示案』，提
示案內對於『陝甘寧邊區』管理問題的規定，比上一擬議又擴大了很多，一共分爲八項：

區域：陝西之綏德、米脂、吳堡、蕪縣、清澗、延安、延長、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縣及定邊清邊兩縣之各一部，（定邊縣城不在內，清邊縣城在內）甘省之合水、環縣及慶陽之一部（縣城在內）以上共十八縣（內定邊清邊慶陽不完整）。

名稱：改爲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爲『陝北行政區公署』。

隸屬及管轄：『陝北行政區公署』暫隸屬行政院，但歸省府指導。又區內各縣，由該區公署直接管轄，不再設中間機關。

組織：區公署設主任一人，其詳細組織由政府以命令定之，縣以下之行政機構一律不得變更。

政令：區內政令，一律遵照政府現在法令辦理。

人員：區內主任，准由朱總司令保荐，其所轄各縣縣長由該區主任保荐，並一律由政府核委之。

駐軍：十八集團軍在陝甘寧留守部隊，一律撤至該區內。（在第二戰區之部隊仍駐原

地作戰。）

附記：除此區以外，其他任何地方，一律不得援例，各方面公務人員以及公物等件經過該區時，不得留難。區內不准擅自發行鈔票。區內人民過去有與十八集團軍感情不融洽者一律不得加以仇視。在綏德須設立軍事委員會辦事處及駐軍。

這一個『中央提示案』是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作成交周恩來，葉劍英攜回延安的，但是，從此以後，便再也沒有下文，一直的讓『陝甘寧邊區』超出了政府的管轄，一直的『獨立』到了今天。

據中共自己說，『邊區』的轄地，是行政院會議通過，又經蔣委員長指定為『邊區政府』轄治及『八路軍募補區』的。但是，中共自己對於『邊區』轄地到底是多少，前後說法卻並不一致。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羅邁對中外記者團說：『邊區所轄地區為延安、延川、延長、綏德、米脂、葭縣、吳堡、神府。（即神求府谷兩縣之大部）安定、安塞、清邊、定邊、志丹（即保安）、甘泉、鄜縣、淳化、拘邑、正

寧、鞏縣、慶陽、合水、鎮原、環縣、豫旺、鹽池、等十六縣。而『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會』所編的『邊政叢書』之『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中，對於『邊區』的轄地却明明的記載著『總計二十三縣』。

這兩個報告的不同之點，是一個說『二十三縣』，一個說『二十六縣』。這兩個報告的相同之點，是全部超出了『中央提示案』內十九縣的規定。

『陝甘寧邊區』是這樣的存在着，而『晉冀魯豫邊區』與『晉冀察邊區』，也同時『宣告成立』。據葉劍英在三十二年所發表的『中共軍事情況』裏說：中共軍已經有了『十三個軍區，二十二個行政公署』。這些『邊區』和『行政公署』的『轄地』，與其他的

地方大致有着兩個不同之點：第一，是這些地域都有着中共的軍隊，第二，是這些邊區都設有銀行印發鈔票。

關於邊幣的發行，據『陝甘寧邊區銀行總經理』黃亞光對中外記者團說，其主要的原

因是爲了政府停發十八集團軍的軍餉。然而政府停發十八集團軍的軍餉是三十年春季的

事情：在廿八年春季以前『邊區』便已經有了『邊幣』，不過那時『邊幣』的名稱還叫做光華代價券，票面的數字，分爲五分、一角、五角、七角五分數種而已。黃亞光同時說，『邊區』是三十年才開始發行的，票面數字則自二元起碼。中外記者團在延安時，的確不會見過一元的『邊幣』，連二元的『邊幣』在市面上也無法看到（當時，市面上通用的『邊幣』票面的數額，早已升到了五百、一千）。黃亞光所說的『邊幣』發行日期，大概是可靠的，不過『邊幣』的『印刷』日期，他並沒有說明。如果按照『陝甘寧邊區政府』於三十年一月三十日明令宣佈停止法幣使用的佈告看來，『邊幣』的『印刷』，至少是在二十九年底政府未曾停發十八集團軍軍餉以前。因爲鈔票的『印刷』，必須經過設計，繪製，造版，印底圖，印號碼等等手續，這些手續的完成，最低限度也得花上半年的時間。

『陝甘寧邊區政府』停止使用法幣的佈告是這樣的：

『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停止法幣行使的佈告（民國三十年一月三十日）

現因時局緊張，政府爲鞏固地方金融保障法幣不外流資敵，特決定辦法如下：

一、從本佈告之日起，邊區境內，停止法幣行使。

二、凡藏有法幣的須向邊區銀行總分行或光華商店兌換邊區票幣行使。

三、禁止私帶法幣出境。但因正常營業或旅行須帶法幣出邊區境外的數在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須申請專員公署核發准許證，直屬各縣，則直接申請財政廳核發；其數在五百元以下的，須申請財政廳核發准許證。

四、凡銀行郵局及其他金融機關承匯款項至邊區境外的，須由匯款人先照第三條規定取得許可證後，才得承匯。

五、凡照第三條規定取得准許證者，得憑證用邊區票幣向邊區銀行總分行或光華商店總分店兌換法幣。

六、凡未取得准許證而私自帶法幣出境數在二百毫瓦上的如係無知誤犯，得勒定存放銀行或兌以邊幣，如係有意破壞法定，重則沒收，輕則處罰。

七、查獲私運法幣出境，經政府沒收或處罰的，其沒收款或處罰款以五成充公，五成

償給查獲人。

自此佈告後，望軍民人等，一律遵照勿違！此佈。」

中共在各「邊區」及各「行政公署」地區所發行的鈔票，有着各種的名稱，除了「陝甘寧邊區銀行鈔票」及「光華流通券」以外，還有「匯通銀行鈔票」（三十一年發行），「晉冀察邊區銀行鈔票」（二十七年二月發行），「淮海流通券」（三十一年發行）等二三十種。同時，黃亞光並說：「邊區」也是發行過「公債」，不過因為成績並不好，後來便不會發行了。

三十三年七月，中外記者團到達延安時，「邊幣」與法幣的比率是八。五比一，就是一元法幣可以換得八元五角「邊幣」，不過兌換的時候是要經過審查的，審查准許以後，才能兌換，如果拿着法幣而不換「邊幣」，事實上的確無法行使，在本國的國土上（非敵佔區），國家所發行的法幣竟然不能行使，實在不免令人覺得有點像出國時必須先行申請外匯一樣的特別之感。所以，中外記者團的國民公報代表周本淵先生總結他對於延安的觀感時說：「我對於延安的觀感，抽象的說來，祇有一句話，這一句話便是，「一切都覺得

特別！」

「黨」內暗潮與張國燾出走

「中共問題」之產生，雖然表面上是由「軍」「政」兩方所造成，而實際的原因，則當然是由於中共「黨」的策略路線「所趨使」。因為連毛澤東先生自己都承認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及「邊區政府」是在中共「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民國二十六年，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以後，曾有不少的中共份子發生了一種懷疑。這種懷疑，大致可以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欣喜於「共赴國難」宣言的發表，但是又因爲這一轉變轉得太快了，進一步懷疑到中共的這種作法是否可以長久支持。第二類是中共的頑固份子，認爲「共赴國難」宣言內的四項諾言，不啻是向國民黨投降，因而懷疑到中共的政策已經澈底的改變。第三類則認爲其四項諾言的發表，就等於表示了中共不再實行共產主義。因而懷疑到中共既要實行三民主義而放棄了共產主義，爲什麼不合併到國民黨

中去，却還要打着共產黨的招牌。這幾種懷疑，從抗戰開始便在中共黨內蔓延着，其間雖經「整風運動」和中共中央一再解釋，却一直到現在還未能釐清，尤其是第三國際解散以後更甚。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趙容便在中共中央直屬大會上說：「有些人聽到共產國際解散便說：『現在的國民黨還是民族聯盟，還是民粹派的性質，所以，共產國際解散以後，中國共產黨可以取消，並且可以合併到國民黨裏去』。這二種叛徒理論，是一種叛階級叛變黨的謬說，我們希望一切犯了投降主義錯誤的人，現在應該立刻覺悟」，由趙容的這一段話，可以見到中共黨內份子對於中共信心已經發生動搖者，大概頗不乏人。這一種內在的危機是中共中央所最爲憂慮的。所以，遠在二十六年秋季，中共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由朱德率領開赴晉西北作戰時，毛澤東先生便曾向出發的部隊作了一個長長的訓話，一再說明中共的立場決不變更，並說明紅軍的改編與「蘇區」的取消，祇是一種應付環境的決策，又說這一決策的實施，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

「相持」。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攻，進而代替國民黨的領導權。

同時，林毓英也在「抗大」演講「黨的策略路線」，引用馬克斯列寧大堆大堆的「理論根據」，一再解釋中共之所以轉變的必要與真正的轉變內容，以堅定一部份中共份子動搖的信心。原文長約五萬餘字，歸納起來，這篇文章所說明的中共之必須與國民黨「妥協」的原因與目的，可以分爲八項：

- 一、放棄以前走不通的路，另覓一條走得通而易於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路。
- 二、掩護祕密工作發展，爭取廣大羣衆力量，以備推翻資產階級政權。
- 三、給革命以休養的時間積聚勢力並準備作新的工作。
- 四、暫時放棄明顯的進攻策略，改爲退守策略，以求退一步，進兩步。
- 五、因爲戰鬪疲乏必須儲存革命力量，故暫時放棄革命制度，放棄表面名目而保存本質，以求將來更大的勝利。

六、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而不是改編。蘇維埃取消改爲邊區政府，其實質仍未改變。

七、現在暫時妥協，是爭取開放黨禁，開放言論結社自由，這都是向無產階級專政之途中走去。

八、現在妥協，是要孤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名義推翻國民政府，以期無產階級專政之實現。」

二十六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抗戰前進及中共之路線」決議，並說明中共的路線是：「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活動，由秘密變爲公開，由局部變爲全面，爲黨取得合法的競爭平等地位。二、在中國政治上的力量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擴大黨的力量，以爲將來取得革命領導權的基礎。」

由於中共在黨內這種明白的昭示，使得「共赴國難」宣言無論是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和一般國人眼中所看到的宣言內容變得迥然不同。而在中共「黨」內也引起了各種

不同的反應。第一類欣喜於中共當局真能深明大義的中共愛國份子，從此便感到了大失所望。中共中央委員兼「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氏走出了延安跑進漢口，便是一個最好的實例。第二類懷疑中共投降國民黨的中共頑固份子，從此遂更加頑固，如十八集團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的王震從前綫打回晉西北，從晉西北又打回陝北，趕走了陝西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何紹南，便是這一類的最好的典型人物。第三類的懷疑者則有兩種反應，意志堅強之真正份子，因此可能脫離中共。如「第八路軍獨立第一師楊武城部騎兵連」中共支部書記李法卿與「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參謀」林波等。而意志薄弱畏首畏尾者，則可能因此而死心追隨中共不敢再作他想。趙容的報告，便是對於這種份子的一個警告。

現在「第八路軍」（中共稱十八集團軍爲八路軍）「新四軍」和各「邊區」各「行政公署」，不但事實上歸中共指揮，連名義上的管轄也依舊的由國民政府又改爲中共了。

因此民國三十一年以後的中共，踏入了一個更「新」的階段。這一階段一直到今天爲止，還沒有何時可以結束的徵兆。

因此，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莫不翹首望天，悵望西北，以企求「政治解決」的飛鴻，能從那延安的天空飛進山城的重慶。

第四章 今日的延安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的一個多月中，平均差不多每天都要有一個到兩個的活動節目，如果將這些參觀記談話記一篇篇的寫起來，也許可以寫上個一年半載，成爲一冊偉大而荒唐「巨著」。但是，作者不能有那樣多的時間，讀者們也不會有那樣多的空閑。所以，這裏的延安見聞錄，只好分爲五類，將作者在一月多的活動節目裏的所見所聞分別的歸納在這五類之中，而概括的說明其意義。

一：中共的「黨」「黨員」和「黨的幹部」

「陝甘寧邊區」的一切措施。都是在中共黨的領導下來活動的。我們要了解「陝甘寧邊區」的各種情況，首先使得對中共的黨黨員和黨的幹部有一個明確的認識，然後才能提

網挈領的再去觀察其他的一切問題。

中共真的是一個政黨嗎？如果按照字面來說，也許我們不能否認中共是一個「在野」的政黨，可是，中共自己本身的想法呢？雖然她也是自稱爲「在野」黨而口口聲聲要求着「開放黨禁」，而他的一切行動和措施，却簡直可以說沒有一件是合乎政黨的要求的。

政黨和政黨之間的鬥爭應該是以有利於人民的政策和辦法來作爲本錢，應該是以不違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宣傳來做爲工具。但是，中共沒有使用這些，她似乎也不要使用這些，她有的祇是黨的軍隊，和黨的軍隊佔領下的土地和人民。

所以，如果嚴格的講起來，中共除了外表上有一個黨的名字以外，其他的一切，實在是和以前的軍閥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但是，以前的軍閥都一個個的倒到台下去了，何以中共能夠獨獨存在到今天呢？第一個最大的原因，當然是由於政府爲了抗戰，一切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寬大政策下，給了中共一個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便是由於中共比軍閥要多一個黨的組織，而這個黨的組織

又是善於應付環境的關係。「進步」，是中共用以轉變方向尋求生路的惟一的工具。僅僅在最近的十年之中，中共急轉九十度直角的大「進步」，已經不知道有了多少次數。俗語說：「窮則變，變則通。」中共由贛南跑到陝北的時期，正是她「窮」已至極的階段。由抗戰直到現在為止，却正是中共「窮」極而「變」的期間。那末中共的將來是否可以由「變」而「通」呢？這一問題的解答，便要看中共的這一「變」「變」得如何了。

中共是一個著名的善「變」的黨，由成立到今天的二十餘年間，便「變」了不知多少次，但是在一般的共產黨人看起來，中共歷次的「變」，「變」得最正確而又最有前途的一次，實莫若抗戰開始的時期了。在「四項諾言」中，中共便直接了當的承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而願意「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這一個出諸一般國人意料以外的一大轉「變」，頗使得一部份的樂觀人士認爲中共在這一「變」，勢將由「變」而「通」，必無疑問，却沒有想到中共的這一「變」，只是變了她的手段，而並沒有「變」她的目的。所謂願爲三民主義而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云云，也只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

在「四項諾言」中，中共明明的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之必需」，並承認「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但是，毛澤東先生在「新民主主義」裏，却又發出「馬列主義爲中國革命最高綱領」的怪論。「四項諾言」中，更明明的承認了「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但是，毛澤東先生在三十三年七月對中外記者圍談話的時候，却又表示在必要的時候，仍將以環境來決定作風。僅僅的從這兩次看來，便可以知道中共的黨的目標，仍然是在想謀取無產階級的專政，仍然沒有放棄她過去在江西所行不通的政策，所謂的「變」，只換湯面並沒有換藥。

「窮則變」，「變則通」的「變」，是要澈首澈尾的大「變」才能「變」得「通」的，中共這一種換湯不換藥的「變」，是否將來可以「變」得「通」，却只有等待歷史來證明了。

中共的黨員

中共對於黨員的控制，是較任何政黨都要來得嚴厲的。在中共的黨內雖然也流行着所謂

的「自我批評」，但是，那最多也不過只是某人批評某人而已，黨員對於黨中央是絕對沒有自由批評的餘地的。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裏，便一再的要黨員「應該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特別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時期，更需要相信與服從中央的領導。」中共不但需要黨員增強「黨性」，無條件的服從黨中央的少數人的意見和命令，並且還要黨員消滅「人性」。劉少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在延安馬列學院講演「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時，便說：「我們不承認在階級社會中有所謂更偉大，更科學的，超階級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騙人的鬼話。」這話就是說，中共黨員對於非黨員的人物的接觸，絕對不能發生絲毫「人性」的情感作用。中共黨員對非黨人士既然不能發洩一點「人性」，那末，在黨內呢？陳雲在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發表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文章裏，不但要黨員，「任何黨內的不准對外公開的事件不能任意向黨外宣佈」，並且就是「任何對其他黨員沒有必要說出的祕密事件」也一律「不准在其他黨員中亂說」。

中共是一天到晚要求「民主」的，我們僅從她對於自己黨員的要求來看，便已經可以知道了中共自己本身所實行的民主的程度是怎樣的了。

中共對於黨員的吸收，也是限制得非常之嚴格的。據陳雲「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裏說：「新黨員入黨時必須經過一定的介紹人，（依黨章目前的規定是：工人，雇農一人介紹，小資產階級出身者二人介紹。脫離其他政黨而加入本黨者三人介紹。）由小組和支部通過，經上級黨委的批准，參加過其他政治派別的份子入黨，必須經過區黨委，中央分局或中央局的批准。」又說：「候補期的長短，根據新黨員的階級成分而定的。目前黨中央暫定候補期間如下：工人雇農不要候補期，貧農與手工業工人一個月，革命學生，知識份子，小職員，中農，革命軍人三個月，其他成份六個月，但在特殊情形下得延長之。」

據作者附註裏說：關於候補黨員的期間之規定，是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黨員的決議」。在發展黨員的決議裏，却來上這樣一個嚴格的限制，在一般人看起來，也許覺得這不但不是發展，而簡直是有些等於緊縮了。但是，在中共本身的利益上

講，這一決議實在是有着莫大的必要時。中共之所以如此規定的藉口，雖然是說非工農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利益認識不夠，可是，實際上不過是爲了加強高級的領導權使得黨員便於控制而已。因爲有了這樣的一個限制，中共的黨員成份，遂讓農民份子佔了中共全黨員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

中共的每一個黨員的介紹人，對於被介紹的新黨員，是終身都負有着責任的。陳雲在「怎樣作一個共產黨員」文章裏說：「他不僅需要精細的留意被介紹者的行動與言語的表現，而且特別應該經常在政治上工作積極的耐心，幫助他教育他。而黨也可以此作爲測驗該黨員對黨負責，忠實於黨的標準之一。」

中共對於黨員的組織訓練雖然如此的嚴格，爲什麼還是有人加入中共做黨員呢？其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可以分爲兩個，一個是由於各階層的人們對於現實的環境之未能盡如理想，另一個則是由於中共的宣傳之能夠動人。已經加入共產黨的人們，有的雖然已經發覺不滿，但在嚴密的組織之上，已經愈陷愈深，不能自拔，有的則在嚴格的訓練之下，不自

知的變成爲頑固。

中共的黨員，便是這樣的終年生活於「特工」式的組織裏，一直的生活到自己欲罷不能的境地。在中共的黨中央提出了「黨員軍事化」的口號以後，中共的黨員們不但要爲黨而犧牲一切，並且要進一步更爲黨而犧牲自己的生命了。因爲中共的黨員不但不能對於黨的規定有所懷疑批評，就是對於指揮自己的黨的幹部的命令，也不能有所違背的。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便說：對於黨員個人不可缺少的利益，固然要顧慮到，並且要「使黨員安心熱情的工作」，「分配黨員適合他個性的工作」而「發揮他的長處」，但是劉少奇接着又說：「被分配的黨員，不能以這一點作爲理由，來拒絕接受黨所給他的工作」。

中共的黨的幹部

中共的幹部是從黨員裏產生出來的，當然是毫無疑問的要遵守着一切的黨員的信條和

規定，幹部與一般黨員的不同之點，僅是在黨的工作上幹部要比黨員要更多擔負一點責任，而黨對於幹部的生活保障，在幹部自己不會死而黨也沒有叫幹部死以前，要比對一般黨員多付出一點便利而已。所以，中共的黨員是在黨的同意下有自己的職業的，而幹部則必需要終身的爲黨服務。

中共對於幹部的教育是非常的重視的。中共訓練黨員，僅是在小組會上或工作上給予以集體的或個別的訓練。而對於幹部的教育工作，則設有專門的學校在。「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報告裏，中共幹部教育經費的支出，便是僅次於軍事被列在第二位的。在幹部教育之中，中共中央於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決定應該以在職幹部教育放在第一位。

中共的幹部教育祇注重三項，三項之間雖然各有特點，而教育原理，則一概是以「恨」字爲其理論依據。第一，中共注意幹部業務教育，在幹部業務教育中，首重實際問題的解決，教育方式，則多採取小組討論的方法。其最成功之點，是適於急用，可以應付目前的

環境：其最大的失敗，則是使得一般幹部養成目光狹小的偏向，除了解決目前自己所遭遇的困難問題以外，不知道「邊區」以外還有着更多的困難。以致於中共幹部所學到的一套，離開中共的小天地便不能使用。第二：中共注重幹部政治教育，中共以前對於幹部的政治教育，是一皈依馬列恩史的理論，現在中共對一切幹部教育的出發點，則必須以毛澤東先生所提的「根據歷史」為所依。使得幹部能將馬列恩史的理論，「透過民族形式」在本國的環境裏活用起來。這一點，最大的成功是宣傳共產主義再不致於令人不懂，最大的失敗，則是愈纏愈不清楚，連幹部自己也不免於更不了解馬列恩史的真正理論的來源。第三，中共注意幹部在職教育，中共規定每一機關的在職幹部每天必須以兩小時來做為學習的時間，各機關的主管人則是當然的指導員。這一項，最大的成功是可以因此使得上下級多所接近，最大的失敗即是易於流為敷衍式，反而延誤了工作的時間。

中共幹部的工作特長，也可以分做三點。第一，深入各階層。中共各級黨部的負責人，工作上的規定是不一定要辦黨的例行公事的。並且，上級還規定各級黨部的幹部人員

必須要參加到本黨駐在地的軍政民衆團體裏去，使得黨的意志，能够透過幹部而到達軍政民衆團體裏去，發生積極作用而順利達成黨的目的。第二：工作第一，中共的幹部雖然也有着中下級之分與待遇上的差別，但是，只要是工作需要的話，一個中委可以馬上去做馬佚，可是他在黨內的地位和待遇却并不因此受到影響。第三，分工的精密。劉少奇說：「任何黨員任何領袖與英雄，他在共產主義事業中，祇能作一部份的工作」。所以，中共對於幹部分工是異常精密的。包辦當然是絕不可能，即使是個人的風頭主義也都在禁止之列。

中共在「整風」以後，黨員和幹部的工作效率，倒的確是被「整」得提高了些，而中共的黨的專制成份也一天天的有了進步。所謂「黨政軍民領導一元化」的次序，也許還有人以爲是黨領導了政，政再領導軍民。却不知中共「整風」以後的黨的地位，已經是被打在毛澤東的地位以下。所以，「黨政軍民領導一元化」，實際上祇是說，中共的「黨政軍民」都要受毛澤東先生一人的指揮，一人的領導而已。

再實際一點講，中共的「黨政軍民領導一元化」，可以說是毛澤東先生（黨）是第一

位：政和軍是第二位，而政的地位要略次於軍，再剩下來的民，便不得不居於最下層的四位了。

如果再換一個方式來解釋中共「黨政軍民領導一元化」的話，我們可以坦白的說，就是有槍的智識份子，（毛澤東先生）一隻手指揮着有槍而無智識的幹部（軍）叫無槍的智識份子（政）去管理既無智識而又無槍的工農大衆（民），一隻手又高捧起既無槍又無智識的工農大衆（民），叫有槍而無智識的幹部（軍）與無槍的智識份子（政）向既無槍又無智識的工農大衆（民）學習。

二：中共的「民主」政治

中共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一天到晚在要求「民主」，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內的一切措施，也是無一不以「民主」號召的，但是，中共自己的「民主」作風，到底「民主」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呢？這一個問題，是值得關懷而且正有很多人在關切着的。

據「陝甘寧邊區」建設簡述裏說：「邊區的民主制度是由下而上，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的人民大眾的民主集中制……邊區司法，亦在政府領導之下，行使其職務，所以，邊區政制是立法司法行政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又說：「我們的口號，是一切爲人民又倚靠人民，我們的方法，是從人民從實際中集中起來，又回到人民與實際中去。」

這一段文章是頗爲值得玩味的，在技巧上說，寫的實在真不算壞。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陝甘寧邊區」僅是一個農村社會，一般農民的知識水準，當然比不上中共黨員，毛澤東先生的辯證法，更是左右民衆的一件有力的武器。所以，事實上中共的「民主」政治的「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少數中共黨員服從多數民衆，所謂的「由下而上」，也並不是民間的意見，可以被中共採納，這僅是透過中共的技術動作，使得一般人民不自知其被愚而已。

這種形式上的「自下而上」和表面上的「少數服從多數」，作法是怎樣呢？舉例來說：中共爲了要增加稅收，擴充實力，不得不榨壓民衆的勞力，發起「生產運動」，於是，

中共便借着「一切爲了抗日，一切爲了人民」的金字招牌，由毛澤東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緊接着中共的黨員便利用羣衆企求提高生活水準的本能與人民敵愾同仇的情緒，將毛澤東的號召加以具體的渲染，使得非努力生產不可的意識深入民間，以爲榨取人民勞力的藉口，然後，再由各縣區鄉村的中共黨員發動人民自己討論如何促進「生產運動」的辦法。等到各地民衆自己商討的各種促進「生產運動」的辦法彙齊，中共便擇其對於自己目的最有利的一條，訂爲金科玉律，用以約束人民。在實行的時間內，這些辦法如果普遍的行不通則中共便根本不必要負什麼責任，如果有少數的不肯奉行這些辦法，中共更可以藉口「辦法，是人民自己擬定的」而予以強迫制裁。這樣作法，表面上實在是有點近於「自下而上」，「少數服從多數的」而事實却正是「自上而下的」，「少數愚弄多數」，不過被愚者無法申訴而已。

中共「民主」政治作風的特點，便是這樣的憑仗着黨的組織力量，被黨員將「上級」所決定的「原則」，配合各地實際情形，宣傳到深入民間，引起普遍的響應，然後，再由

黨員發動人民，讓人民在這個「原則」下作繭自縛。中共這種「原則自上而下」，「辦法自下而上」的作法，實際上倒的確是收了不少的效果。

「陝甘寧邊區」裏既然也有着一百多萬人口，自然的也就會分做若干階層。大概的說，可以分爲智識份子，地主和農民三大類。中共爲了要標榜自己的「民主」，便不得不將這三大類人分做三種方式來分別的加以管理，「參議會」，是中共收容智識份子的大本營，利用智識份子的總樞紐。「勞動英雄」，和「二流子」，便是組織農民驅使農民的最好工具。地主和士紳，則被中共一古腦兒放在各級的鄉縣區的「政府」裏，讓他們在「黨」的領導下演傀儡戲玩。同時，中共並在這三大階層的機構裏，插進大批的「黨員」和「黨的幹部」，以爲策動某一設施的原動力，就這樣，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民主」政治的悲喜劇，便鑼鼓喧天的上演起來。

現在，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來看一段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內所耍的把戲，究竟是內容如何？

「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的選舉：

「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是中共所標榜的「民意機構」，「邊區政府」的「委員」與「正副主席」都要在「邊區」的「參議員」中選舉。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所提出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第五條裏，規定「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羣衆團體進行選舉聯盟，并在應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爲某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爲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這裏所謂的「在選舉名單中確定共產黨人只佔三分之一」的規定，便是中共所標榜的「民主」，也就是中共所謂的「三三制」，但是實際上^①是怎樣呢？「陝甘寧邊區政府祕書長李維漢」，「邊區參議會議長」高崗，「副議長」謝覺哉，在招待中外記者團的招待會上，都一致承認，邊區參議會議員中，共產黨人仍超過三

分之一。「邊區政府機關的一般職員中，共產黨人尚佔多數」。這種不能「民主」不能實行「三三制」的原因，李維漢的解釋是：「由於戰爭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的限制所使然。至於什麼叫「戰事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其「限制」又是如何？則李氏並沒有再繼續的解釋下去。

中共的黨員既然在「陝甘寧邊區」的「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裏都佔多數，則中共的「政策」，自然便可以毫無問題的在「邊區」裏全部通過實施了。但是，「邊區」內各縣各鄉的「參議會」的「議員」，由共的黨員事實上是無法都佔多數的，所以，在三十二年的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又頒布了一個「陝甘寧邊區政紀總則草案」，一方面規定「各級參議會各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各級政府服從各該級參議會之決定」。同時，又規定「下級參議會無權改變或否決上級參議會或上級政府議決之法令與命令，上級政府對下級參議會之決議，認爲不當時，有權停止其執行或糾正之」。這便是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內所實施的「民主」「憲政」。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裏所辦的選舉，是有着一個特點的，這特點便是一切爲了「黨」的利益，一切爲了「黨」的本身打算。所以「陝甘寧邊區」裏雖然除了中共以外便根本上沒有其他的什麼「黨」「派」，而中共却偏要商訂着「邊區參議員的候選人各黨各派都有推舉權」。結果，當然是中共的黨員佔了多數，有時雖然也有幾個可以算做無黨無派的人物，但是，這些人不過祇是湊熱鬧幫忙而已。縱然有時也發表一點意見，如果這意見不符中共的要求時，不但根本上便無法通過，甚至還要引起對於自己頗多不利的問題。反過來說：「邊區」的人民，祇要能够肯在中共的命令下去爲中共的一切去努力，則不管你本身怎樣，中共都可以設法使你當選。如「邊區」各地駐軍以及居留「邊區」的外籍人士，也都有被「邊區政府」聘爲「參議員」的資格：三五九旅的旅長王震，荷蘭，印度，日本的共產黨員森健，阿里阿孔，巴蘇華等之被聘爲「邊區參議員」，便是一個最好的例證。高崗，謝覺哉對於外籍人士被聘爲「邊區參議員」的解釋是：「只要是反法西斯的人士而肯於爲中國的抗戰工作的，中共當不分國籍一律歡迎」。作者爲了中共的這特殊的措施問過

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的高崗：「延安如果有很多的外籍人士都願意爲中國的抗戰工作，而都被「聘」到「邊區參議會」裏去，以致於外籍的「邊區參議員」的數量反超出了原有本國「邊區參議員」的數量時，「邊區參議會」不是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民意機構」了嗎？」高崗聽了這話，大概是很不高興，半天，他將桌子一拍問道：「這有什麼關係呢？你不想把中國搞好嗎？」

中共的民衆組織工作

中共現在對於「陝甘寧邊區」的民衆最大的要求，一個是要民衆加緊生產，以「發展經濟」「發展事業」，另一個是要民衆參加「自衛軍」，以作軍隊的補充。在這樣兩個目標下，中共驅使民衆的武器是「找典型」組訓民衆的方法，則是要大家「勞動互助」，「保衛邊區」。

在「陝甘寧邊區」裏的典型人物，可以分做兩種。一種好的典型人物叫做「勞動英

「英雄」，一種壞的典型人物叫做「二流子」。「勞動英雄」是到處受人尊敬的如現在的吳滿有，趙占魁等，他們可以出席「邊區參議會」或「一攬子會」，也可以與毛澤東林伯渠對坐談天。「二流子」則到處遭受白眼，到處受人鄙視，如果有人在門上被中共釘上了一塊「二流子」的木牌，那便簡直是等於被擯於社會人羣以外，再也休想立足生存。

中共利用着「抗日必須努力生產」的招牌，到處去找這兩種典型人物，遇有肯於拚老命而認真耕作以增加中共的「農業稅收」的農民，中共便命令黨員發動羣衆選他爲「勞動英雄」，而給予以特殊的便利和光榮，使其由貧農變成中農，由中農變成地主，使其感激到不得不爲中共致死。如「邊區」的第一個「勞動英雄」吳滿有，便感激到發狂的高呼：「毛主席真是我們的命根子」。遇有不肯供獻過分的勞力者，中共則給予以「二流子」的頭銜，命令黨員發動羣衆天天開大會打擊他，使之不能生存，或是不得不俯首就範的去開荒耕地。至於介乎兩者之間的一般農民，在這種情形下，當然就不敢不以「勞動英雄」爲模範，一任中共的榨壓了。於是，中共便再弄「勞動英雄」的號召，分別的將各地的壯

丁組成「變工」「札工」「運輸」等隊，美其名曰「人民自動的勞動互助」。而實際上則是變相的將人民加以控制并榨取其過分的勞力。同時，這些「變工」「札工」「運輸」等隊裏的及齡壯丁，便都成了「陝甘寧邊區」的「普通自衛軍」的基本補充隊伍，而「普通自衛軍」中的優秀份子，便要抽調出來，作為中共軍的後備部隊。

中共組訓民衆的技術，是相當的巧妙的，「透過民族形式」的宣傳，是中共組訓民衆的先鋒。中共要將人民組織起來，加緊生產，宣傳方面便提出了「提高生產效率，爭取豐衣足食」的口號來激動人民求取美滿生活的慾望，中共要想人民參加軍隊擴張實力，宣傳方面便提出「團結抗日」「保衛邊區」的口號來啓迪人民敵愾同仇情緒。因此，中共現在在「陝甘寧邊區」裏的民衆組訓工作，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但是，「陝甘寧邊區」裏的民衆們，在這種嚴密的管制下，却早已失却了個人應有的自由。在「邊區」以內，由甲地到乙地，都要請得「路條」，才能通過，如果要想到「邊區」以外的地帶去，那情形，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中共對於封建勢力和封建思想的運用

中共由贛南竄抵陝北以後，因為本身力量已經損失得過於薄弱了，不得不遷就張國燾部下的土共高崗劉志丹等以休養喘息；抗戰開始，中共更爲着要想趁戰時的混亂狀態立定脚跟打穩基礎，更不得利用當地的封建勢力以爭取人心。於是，陝北中土的高崗遂一躍而爲中共中央的西北局的書記，而綏德大地主的劣紳李鼎銘也沐猴而冠的當起「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

中共之所以利用李鼎銘，其最初的用意，大概總不外乎想藉此標榜「民主」，並說明其對於過去在江西時的「土地政策」的改變。李鼎銘以一個「應該」被中共照例夷其九族的劣紳，而竟然能被中共垂青，一躍而爲「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副主席」，在李氏本人，當然是感激萬分而不得不傾其全力；在中共，找到這樣一個輕體動物來做奴隸，自然也就無一事不被採納，無一事不便利通行。

李鼎銘在「陝甘寧邊區」裏並不是沒有作用的，他們的確是替中共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因為他在中共的黨內沒有一點功勞，所以他的地位并不能切合他的「身份」（假如

「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頭銜可以算做身份的話）一個中共的幹部是隨時都可以污辱這可憐虫的。朱德招待中外記者團時，作者便和李鼎銘、李維漢、王震三人一棹。李鼎銘偶然提到三十三年陝北棉花因天寒而凍死頗多的情形，王震便直斥他道：「你聽那個說的。我們金盆壩種的棉花。根本上便可以收成很好。」

中共對於封建思想的運用，也是相當的成功的。「陝甘寧邊區」地帶過去都經苦旱，最近幾年來，因為雨水調和，收成都還算好。中共爲了要在人民中取得信仰，便說陝北天時的變化是由于他們帶來。于是不知怎樣的民間流行起兩個小故事，一個是說「澤」者，「水」也，陝北的洪水霑足，實在是應該歸功于毛「澤」東帶了「水」來。另一個說是「賀龍」者「活龍也」，「活龍」（賀龍）駐防陝北，安得無雨？這種封建思想的宣傳舉動，本來已經是幼稚得可憐亦復可笑了，不料「邊區」小學教科書裏竟然也有着「太陽出來一點紅，東方出了個毛澤東」的論調，照我國的習慣來講，這簡直是以毛澤東比做皇帝了。中共封建思想之濃厚，實在是出乎一般意料之外。

現在，我們可以綜結起來說：中共的「民主」制度是口頭爲了人民，實際爲了自己，使用少數的黨員，去憑弄多數的民衆，利用少數典型人物，壓迫多數工農份子，在一切爲了黨的利益的原則下，立法、司法、行政都在黨的支配下而行使其職權。所以「陝甘寧邊區」內所實施的「民主」，便是透過「民主」中形式的獨裁；「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便等於封建時代的君主的集權。

三：中共的軍事

毛澤東先生在中共黨辦刊物「共產黨人」的創刊號裏說：「我們政治路線的重要部份，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中共中央在「抗戰的估計與黨的任務」一文中也說：「將來誰領導誰？便要看誰的武裝大來決定」。同時，中共華中局「友軍工作策略」一文中，更明白的指出：「在羣衆覺悟性落後的中國，武裝更成爲一切動力的前提」。「有了武裝，便可以有了一切」。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共

之所以能够繼續發展黨的組織不散，並且一直能够存在到今天，得力於這種暴力的資助，實在是一件不容諱言的事實。而國人之所以不以一般政黨來看待中共，也便是由於中共黨的後面，還有着軍的關係。

中共是「以黨治軍」的。中共所派在各級部隊裏的政治委員，便有着與各級部隊指揮官同樣甚至超過的權力。任何一件事情，無論是士兵教育或是作戰命令，都必需要經過政治委員的副署才能生效；而各級部隊裏的政治委員，也必需要向中共負責聯繫各階級服務部隊士兵官佐的情感，並對各該級服務部隊的官兵施以精神教育。這一點，中共作得實在是澈底而又成功的。朱德在三十二年七月四日的中國記者招待會上，便會說：「我們的軍隊，現在已經作到堅決服從黨的命令的地步，而可以不以各個部隊長官來統率隊伍。只要是事實上有所必要，在黨的命令下，各個部隊的長官都可以隨便互調而絕不會影響到戰鬥力量」。這句話的可靠性是不是百分之百，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不過在中共積極的「整風」以後，除了毛澤東先生外，對於各單位主管人員單獨發生積極的個人領導作用，而確實是

生反對「宗派主義」的口號下禁止得異常嚴厲的。過去，在中共的內部中雖然有着各種不同的「路線問題」，而在同一時間之內，則絕對不會允許有兩條不同的「路線」存在的。所以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一個個相繼倒台之後，陳紹禹，張國燾等也都是爲了「路線」的問題，而不得不一個赴蘇，一個出走了事。

士兵的教育

中共的軍事教育，可以分做作戰教育和精神教育兩方面來看；中共對於這兩種軍事教育，都是有着一種另成一家的特徵的。

中共對於軍隊作戰訓練的特徵，是祇按自己本身的需要而注意於應用技術的訓練的，至於這種訓練是否合乎現在抗戰的要求，中共却并不理會。現在中共對於軍隊的作戰訓練是以毛澤東先生的「游擊戰」爲圭臬的。毛澤東先生的「游擊戰」的內容，有一個原則四個手段，原則是「不打敗仗」；手段是「敵來我退，敵退我進，敵強我散（即化整

爲零」，敵疲我擾」。所以，中共軍的作戰訓練，也就根本不注重基本動作。以致於連朱德自己也承認中共的「善於游擊的部隊如果要改作正規軍來担任正面戰場的抗敵任務，至少還得要加上一年半載的訓練」。朱德的這幾句話，是說得非常誠懇而坦白的。因爲作戰的目的，不外乎要達成兩種任務，第一是攻（佔領），第二是守（却敵）。中共的游擊戰」，在攻的方面，既不能完成佔領的使命，在守的方面，又不能克盡却敵的職責。所以，在軍事學上嚴格的講起來，中共的軍隊祇能作一種補助兵種，并不能單獨作戰。

中共兵的作戰技術訓練，雖然也有着各種科目，但是，歸納起來，却只有兩項目的。第一，是要「跑得快」，第二是要「打得準」。

據三五九旅旅長王震說：中共的軍隊「能够在一分鐘內越得三個不同的障礙，擲出三個手榴彈，殺傷五個假想敵」。中外記者團在延安參觀警備司令部戰士的表演時，能够在一分鐘內作完這幾項動作的，倒也的確不少。不過我們這一些文縐縐的團員裏却也有幾位竟然能完成了這個目標。

「跑得快」是中共軍隊傳統特長，「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國軍有時竟不免追之不及，「打得準」的程度如何，僅就中外記者團在「陝甘寧邊區」金盆塢參觀三五九旅迫擊砲實彈射擊而論，三砲僅中一砲，成績還差。步槍射擊進度，則記者團並沒有看到。

中共對於軍隊的精神教育的特徵，實際上祇有一個恨字，處處都在培養軍隊對於國軍的仇恨心理。編造通俗的歌曲，如「親日派，沒天良，一心只打共產黨」等歌，以教育軍隊，以增強其對於國軍的仇視。中外記者團在「陝甘寧邊區」的時候，便隨時可以聽到中共軍隊的官佐告訴戰士們說：「他們今天要開荒，兩手都摩出了血泡，都是爲了政府不給你們發餉」。至於政府爲什麼不給中共軍隊發餉的原因和經過，則中共便根本不提，戰士們當然也就無從知道。

中共爲了物資食糧的不足，一般的部隊，原則上是必需自食其力的，開荒，便是「陝甘寧邊區」內中共軍的唯一任務。所以，中外記者團在「陝甘寧邊區」內參觀中共的軍隊時，祇能說是等於參觀了一個個的集體農場，而並沒有參觀到什麼大的作戰演習。事實

上，「陝甘寧邊區」內的中共軍隊，雖然沒有脫離生產，却早已經脫離戰鬥了。在洛川，記者團遇見過九個由延安逃出來的中共的士兵。據他們說：中共軍隊因為自己努力開荒的結果，三餐小米飯可以吃飽，倒還不成什麼問題，不過這種努力的榨壓，却使得很多人不能生活，他們之所以要開小差，也便是爲了這個原因。同時，爲了開荒不是軍人本身必負的工作而不願參加生產者，當然也大有人在，祇是在嚴密的控制與漂亮的口號之下，不敢不俯首就範而已。

兵員的補充

中共兵員的補充，辦理得是頗爲嚴格的，在中共地區內，逃避「兵役」，幾乎是不能的事情，因爲在我國目前的社會裏，農民成份依然是佔着全人口總數的絕對多數，而壯丁的來源，則幾乎百分之百的出於農村，在中共的努力範圍內的地域裏，「徵兵」的第一步辦法，便是先以「提高生活」，「增加生產」爲號召，將所有的努力，都組成「扎

工」，「變工」「運輸」等隊，而美其名曰「勞動互助」，這樣一來，所有的農村裏的壯丁數額，當然就容易調查而全盤清楚，於是，中共便將這些「扎工」「變工」「運輸」等隊裏的青年壯丁，分別在各該耕作地區加以組織，予以軍事訓練，名之爲「普通自衛軍」，担任各該耕作地區的保衛治安工作，同時更從這些「普通自衛軍」中抽出若干最健壯的青年，予以更嚴格的作戰教育與精神教育，組成「基幹自衛軍」担任中共正規軍的後方勤務，中共的正規軍需要補充的時候，便從這些「基幹自衛軍」中再來抽調。因此，「陝甘寧邊區」內的青年農民，遂無一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而不能不爲中共利用。據李維漢說：「陝甘寧邊區」的壯丁，到三十三年初春爲止，已經組織成普通自衛軍的總數，是十四萬五千三百五十人，由普通自衛軍中抽出來的基幹自衛軍，也已經有了兩萬一千八百零五名」。以僅有一百四十幾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竟然能够「繳」出十分之一以上的壯丁，中共對於民衆的榨壓，真可以說是相當可觀了。

作戰的實力

中共軍隊的人數究竟有多少？作戰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呢？據朱德說：中共現有正規軍游擊隊四十七萬，民兵兩百萬」。葉劍英在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對中外記者團說：中共軍隊現在抗擊的敵人，佔敵人在華軍總數百分之六十四點五，而國民黨軍隊（中共是一貫稱政府爲國民黨，稱國軍爲國民黨軍）則僅抗擊在華敵軍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五」。而毛澤東先生在同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對「延安」的學生說，「中共軍抗敵人的數量，約佔在華敵軍總數百分之五十八」。究竟是葉劍英所說的數目對，還是毛澤東所說的數目對，我們當然無法知道，不過他們兩個人的話都有著一個相同點，就是無非是說：「中共軍抗擊的敵人要比國軍來得多」。

中共軍隊抗擊敵人的數目真的這樣多嗎？以一個朱德自己都承認祇能游擊而不能銳攻堅守的部隊，竟能抗擊敵人在華機械化的部隊總數百分之六十四或百分之五十八嗎？這

一問題，我們實在是不無疑問。但是，淪陷區和敵後逃出來的人民說：「葉劍英所說的數目字倒當真是的確的，不過另外還要解釋的，是至少有敵軍在華總數百分之三十五點五以上，日夜的與國軍在以血肉相撕拚，而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八或六十四點五在華敵軍，則是與一個中共軍或是幾個中共軍遙遙的對望着。換一句話說，就是在無數的國軍的對面至有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在華敵軍不斷的遭受着國軍的抗擊，其餘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在華敵軍，則是僅僅與少數的中共軍相持着或是捉迷藏般在繞着圈子」。如果這也可以叫做「抗擊」的話，那末，全部在華敵軍都可以說是南京偽組織的「俘虜」了。

中共的正規軍游擊隊，抗戰以後改編為國軍的時候，至多不過五六萬人，近幾年來，經中共積極擴充的結果，數量上，當然是可能有了增加，但是，到底是否已經增加到了「四十七萬」，則朱德並沒有拿出什麼說明來，所以我們無法證實。不過中共的二百萬「民兵」，則根本上便不是屬於中共的。據華北淪陷區來人談，敵後民衆的抗日情緒是極高的。到處幾乎都有着「民團」「自衛軍」的組織。自然，中共的敵後「地下活動」的工作

人員，有時也和這些「民團」「自衛軍」有些聯絡，這些民兵，雖然也知道中共也是中國人，究竟要比敵人強些，可是，爲了中共的「游擊戰」，「戰」之後，馬上便要快跑，甚至連房子都要燒掉，並不能達到其「保衛家鄉」的目的，所以，敵後的人民，總是常常的懷念着國軍和蔣委員長，他們每每嘆息着說：「幾時蔣委員長帶兵來就好，他來了，我們便可以不受敵人的榨壓，也不要再跑了」。

中共的兵員與槍枝的比較，據葉劍英說是五與三之比。中共軍既然祇「游擊」，重武器當然無法使用，而且也不可能。擲彈筒和手榴彈，中共雖能製造，而產量並不大，所以中共軍隊惟一的武器硬要算做步槍了。中外記者圍在「陝甘寧邊區」裏所看到的三五九旅的戰士們使用的槍枝，以晉造爲最多，（大概是從閻錫山長官那裏「搞」來的）。漢陽造三八式次之，中正式、捷克式有而頗少。據王震說：「三八式槍全是得自敵人的」；但是，作者在延安參觀魯藝學院時，便有不少中共在華北所設的「聯大」的學生紛紛告訴我敵後的情形。他們說：「偽軍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下，肯替敵人認真拚命的簡

直可以說是沒有，這些偽軍奉到敵人命令來「掃蕩」中共軍的時候，中共軍便可以給他們一點錢，將他們的槍枝全部購來，這些槍，都是很好的三八式。偽軍們得了一筆錢之後，馬上便轉去了，他們所售出的槍枝，便全部的向敵人報了損失」。這幾句話，便充分的說明了中共軍三八式槍等戰利品的來源。

中共軍隊從抗戰開始，便是這樣的存在着，「游擊」着，並且在不斷的擴大着。一直到現在為止一切還是這樣。

四：中共的財政與經濟

毛澤東在解放社的『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一書中說：『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與財政工作的總方針。但有許多同志，看重了財政，不懂得經濟的重要性，他們的腦子，終日只在單純的財政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打來打去，還是不能解決問題。』

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足影響經濟，但決定財政的却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使財政充裕的。」

現在「陝甘寧邊區」所實施的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便是根據毛澤東的一段話來擬定的。所以，「陝甘寧邊區」的一切財政經濟工作，都以「解決問題」為其出發點。「解決」什麼「問題」，怎樣「解決問題」呢？毛澤東在這本書中又說：

我們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與工作人員的生活費與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就是抗日經濟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就是由人民的租稅和幾萬軍隊與工作人員自己生產來解決的，不發展民營經濟及公營經濟就只有束手待斃。」

這幾句話是非常中肯的。「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着眼點，是從這一個現實的要求出發，但是，它們並不是單單要『解決』工作人員的生活『問題』而已，與『解決』工作人員生活『問題』並進的，它們還要求『事業』的『發展』，要『發展』『事業』，自然離不開『錢』字，要『錢』，當然就得從增加收入着手，所以，毛澤東在這本書中又說：

「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了發展經濟，忘記了開闢財源，而只圖從收縮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保守的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共的財政政策與經濟政策，是開源而不節流，是「發展」它自己的「事業」不惜加緊榨壓人民和它自己的軍隊與工作人員的努力，而不是「收縮」它的「開支」以培養國家民族的元氣。

因此「陝甘寧邊區」的財政開支。也就有了他的特點。民國二十八年到三十年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裏說：

「我們的經費分配：用之於保護邊區的軍事費的開支出佔第一位，用之於培養大批幹部的教育費就佔了第二位。行政費則極力緊縮；建設費的投資二十九年二百多萬，三十四年四百多萬。」

「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便這樣的被分配着，一直到現在為止。

關係「邊區」生命的食鹽

食鹽，是「陝甘寧邊區」出產的主要物資，凡是「陝甘寧邊區」不出產的日用必需物品，如棉花布疋之類，都要靠着食鹽換取，因此，在「陝甘寧邊區」的財政收入中，食鹽便佔據了一個最重要的成分。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義務裏，運鹽也就成了一種最令人頭痛的担負。

據「陝甘寧邊區」的貿易公司總經理葉繼莊說：「三邊之鹽，儘人可取，但不能自由貿易，而必須俾與財廳稅務局，出口則悉由光華公司經理。民衆運鹽爲義務性質，邊區各縣人民均有運鹽之義務，每縣（或每萬人）中每年應運鹽若干，及運鹽里程長短，均視事實需要平均分配。各部隊可以自由運鹽與陝晉兩省交換必需物資，惟須經上級批准」。

二邊鹽價每駝（一五〇斤）三百元「邊幣」，（註：邊幣八元五角合法幣一元）加上稅收一千六百元，成本約合一千九百元，由三邊運至延安，需時二十二日以上，每日每駝

運費至少七百元，運至延安後，已值一萬七千三百元。延安收價，三十三年六月份僅一萬六千元，而售價則兩萬四千元。所以，每人運鹽一駝由三邊至延安，除去一個月的勞力損失不算外，還要賠本一千三百元，如果走的天數多，當然還不止此數。不過據「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說：「民衆運鹽時不止一人僅運一駝，運的數量多，則運費自可減少，並且交鹽時可以僅交一百零五斤，所以民衆沒有什麼損失」。這幾句話，縱然不是強辯之詞，但以民衆近一個月的勞力犧牲而言，負擔也就可以說是不爲不重了。

據南漢宸說「三邊的鹽田，共有二千六百九十二畝，鹽工二萬一千一百二十二，鹽家五百二十一月，三十二年產鹽五十二萬一千駝，民衆運鹽十萬駝」。剩餘的四十二萬一千駝，南漢宸並沒有說明是怎樣運輸的，大概是除去「陝甘寧邊區」軍民的食用之外，都被各部隊所運售了。三十二年民衆運鹽的數量，據南漢宸說，「僅八萬五千駝」。這種運輸量的減少，如果是確實的話，一方面可以說是「陝甘寧邊區」食鹽出口的減低，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各部隊不經過「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正式手續而運售的食鹽在日漸增多。

「陝甘寧邊區」的出口物品，另外還有皮毛藥材等項，不過和食鹽比起來，數量上差得太遠，重要性自然也不及食鹽大了。如果三邊的產鹽區不「屬」於中共的話，毛澤東所說的「束手待斃」，是很有其可能的。

開荒和農業稅

「陝甘寧邊區」的發展經濟工作，目前是以農業放在第一位的。開荒和植棉，在解決衣食問題的迫切需求下，發展得異常的迅速。雖然陝北不宜植棉，棉花布疋還不能自給自足，而有關於農業的稅收額，都與食糧的增產而成爲正比的增加了。

據「陝甘寧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報告：

「陝甘寧邊區」的農業稅，原先稱爲「救國公糧」，後來才改爲「農業統一累進稅」，以每人六斗五升爲起徵標準，不足六斗五升者免徵。六斗五升以上者，由百分之三累進至百分之三十五。農民對於地主的交租，最高額不得超過千分之三七五，毛澤東告訴一般農

民：「三十二年要做到耕三餘一的糧度」，據南漢宸說：「三十二年內一般農民已經可以耕三餘一了」。在「陝甘寧邊區」的農業發展，在中共加緊榨壓農民的集體勞力的威迫之下，進展的速度是異常可觀的。軍隊的開荒成績，也一年年的有着很大的進步。據「陝甘寧邊區建設廳長」高自立說：「三五九旅三十三年可收糧三萬石，除食用外，還可以交一萬石公糧。」

「陝甘寧邊區」農業稅收的另一特點，便不是收錢，祇收糧，各縣所收的公糧以區為單位的存儲在倉庫中，並不集中起來。據「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中說：這是爲了「可以使軍隊在作戰時期，打到那裏，吃到那裏。」

「救國公糧」是每人實收四百斤起徵，徵收率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其不同於「農業統一累進稅」的，是一方面訂有征收累進比率的條例，一面又有着指定完成若干石的任務。據南漢宸說：「農業統一累進稅」，便是根據「救國公糧」的標準製訂。是否同時並收，南漢宸並沒有加以說明，實際上也許可能是兩種稅收都一直在並行着。而以「農

業統一累進稅』的稅歸於「陝甘寧邊區政府」，另以「救國公糧」所收的實物分區儲存，以爲「軍事行動」時的軍用糧食。

「邊區」的工商業

「陝甘寧邊區」的商業是幼稚得十二分的可憐的。但是，在它的發展和管理上講，却也有着不少的特徵。

第一：「陝甘寧邊區」的工業，是近兩年才逐漸發達起來的。據高自立說：「爲了事實上的需要，今年在發展經濟計劃中居於第一位的農業，明年或轉爲第二，而原居第二位的工業，很可能的將居於第一位。」這句話，是相當的可靠的。一方面它說明了「陝甘寧邊區」的軍民在胼手胝足的努力下，吃飯已不成問題，另一方面，它也說明了中共爲着「發展」它的「事業」，對於工業的發展是如何迫切的需求和努力。

「陝甘寧邊區」的工業，最近兩年之能够由艱苦困難中一步步的走向軌道，實在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說：『要使得中國走近工業化國家的領域裏去，首先得先從發展手工業做起：如果連手工業都可以做的東西都要買舶來品，還侈談什麼建立機器工業，豈不是捨近求遠？』（毛澤東三十三年七月四日對中外記者談）這幾句話便是『陝甘寧邊區』發展工業的方向，所以，在『陝甘寧邊區』裏，手工業的發展是很大的，差不多除了可以耕田的民衆之外，幾乎沒有人不在紡織，就是機關工作人員和一般的民間婦女，也無不人手一件紡織機。甚至於各校學生教員也難例外。三十二年民間紗婦便有十六萬三千四百五十七人。紡紗八三五八四九·九斤，三十三年機關紡紗人員共有一萬一千人，共紡毛紗六二七七九斤。這個數目雖然並不算大，可是按照一百四十多萬的人口比例講來，動員的成績和出品的數量都可以說已經是相當可觀了。

『陝甘寧邊區』的機器工業，到現在仍是異常的幼稚的。除了軍火製造，藥品製造之外，其他如紙張磁器以及一般日用物品，都還是以手工製造者爲多。藥品製造方面，大概可以提煉中藥的丸或散，嗎啡安甌等也漸能自製，軍火工廠則以製造手榴彈爲大條，做造

中正式的步槍，式樣尙行，惟槍身過重，鋼質不純，擲彈筒之製造頗爲有趣，其法係以原鐵鍊成長條，再將長鐵條盤爲圓筒，最後加以捶煉，故筒身雖爲鐵製，而耐熱程度與伸縮性則遠較一般鐵製者爲強大，其用心誠可謂不爲不苦矣。

「陝甘寧邊區」的工廠，多半係由公營。故一切工業成品，均無稅收。也就爲了多半是公營廠，所以管理也比較容易。節約兩字，確實是做到了至矣盡矣。而廢物利用，卽至一草一木之微，也絕對不准棄置不顧。這可以說第一個特點。非必需物品絕不製造，已能製造的物品絕對不許向外購買，這可以說是第二個特點。由於這兩個特點。保障了「陝甘寧邊區」的工業，才一步步的走入軌道，踏進正途。

第二：「陝甘寧邊區」的商業，現在仍是原始型的以物易物制。雖然也有貨幣的交易，實際上仍是以物計值再加折合而已。

據南漢宸說：「陝甘寧邊區的私人商業本約十二萬萬四千四百零一萬邊幣」。公營商店的資本額，南漢宸並沒有報告，據公營商店的規模遠較私營商店爲大（如南昌公司等）

看來，資本額也許還不止此數，因為私營商店資本小而分散的家數多，公營商店資本既大而又集中，所以物價的控制，也就比較簡單而易於收效，在『陝甘寧邊區』內差不多每個機關每個部隊都有着合作社的組織，這種合作社，便是民營商店的勁敵。

「陝甘寧邊區」內的物價，波動得也相當的厲害的。據葉繼莊說：『三十二年內，邊區的鹽價漲了五倍多，土布已漲了十八倍多，棉花竟漲到二十八倍以上。』

在『陝甘寧邊區』內，工業因為全係公營，所以沒有稅，商業稅呢？據『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說：『二十九年冬，寒衣代金向商人募得三百四十萬元邊幣，三十年製定商業累進稅條例，因稽算困難，每市每年估價一次，規定每月每家納多少。』從這段記載裏，大概可以見到商業的稅收也相當有限。有一種『通過稅』，是對於『陝甘寧邊區』運銷外省的貨物的稅收，但是，主要的物資輸出既已多由公營，則此種『通過稅』的收入當然不會很大。

合作社和銀行

「陝甘寧邊區」的稅收既然不過如此，中共的「軍事費」與「事業費」怎樣維持呢？據「陝甘寧邊區政府」二十八年至三十年的工作報告中說：「政府收支，全靠特種收入，沒收戰事繳獲，銀行貿易局的營業等。」這裏所說的「特種收入」，「不知究竟是什麼東西。據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洛川所見到的幾位由中共軍內逃出來的戰士說：「陝甘寧邊區內是種有大批雅片的，種植的地點多在離開公路三十里以外的山溝內，種烟的多是部隊裏的士兵，民衆種烟，則絕對的禁止。」這種特種收入，很可能的是指雅片而言。「銀行貿易局的營業」。大概就是發行「邊幣」了。

中共之發行「邊幣」，據「陝甘寧邊區銀行總經理」亞光說：「邊幣之發行，係因政府停發八路軍之軍餉，三十年才開始發行二元、五元、十元的三種邊幣，三十年以前所發行者，僅係光華代價券，票面亦僅二分、五角、一角、七角、五分四種，因係專爲法幣找

零之用，故未超過一元。」但是「陝甘寧邊區內現在流通的『邊幣』，起碼是五元一張，最高額有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五百元以至一千元者，二元之『邊幣』已不易找，間尙有一元之『邊幣』，想係發行期過早，故黃亞光不肯承認，然七角五分以上不從一元發行起，即逕行印發二元之票面，天下寧有是理，寧有是事？

中共之大量發行「邊幣」，其用心無非搜括民間物資，以換取法幣，貨物，但是，中共之「邊幣」，因其保證不足以取信於人民，故波動極大，據黃亞光說：「最初邊幣與法幣的比值是一比一點五。即法幣一元，可換偽幣一元五角，三十二年因邊區人民心浮動，法幣需要量激增，一時曾漲至一與十之比，後來情形漸定，生產增加，才又穩定下來。」到三十三年七月為止，「邊區幣」八元五角，可換法幣一元，法幣在「陝甘寧邊區」內是禁止使用的，兌換時也要經過審查。

中共的「陝甘寧邊區銀行」有着兩種作用，第一：發行「邊幣」週轉財政。第二：支持合作社（公營商店）的業務，以吸收民間的游資貨物。

關於財政週轉方面，據南漢宸說：「因為封鎖關係，邊區對外貿易受到不等價交換的壓迫，致財政上略感不支，三十二年向銀行的透支額區財政支出總數百分之十八，今（三十三年）年因不少軍隊由外面調回，故財政預算又較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希望靠自己動手發展生產的結果，不再回銀行透支」。這段話有兩點可以注意。（一）去（二十二）年透支額百分之十八可能不止此數。（二）今（三十四）年財政預算的增加是爲了有大批軍隊調回。

關於支持合作社業務方面，中共的辦法是很好的，「邊區銀行」的放款如農貸之類要透過合作社，民衆的物資貨幣，均可加入合作社爲股東，因爲合作社太普遍了，又有着「邊區銀行」作爲保證，所以還能得到一般人民的信仰。發展得非常迅速。到三十三年二月底爲止，「陝甘寧邊區」內已有消費社二八一，生產社一一四。運輸社二二三，借用社六，農場社七，醫藥社二三。

一般民衆有了實物或貨幣以後，因爲合作社的利息很高，都願意大批入股，合作社既

然掌握了大批的游資和實物，當然就可以向『陝甘寧邊區』以外去做買賣。於是，合作社使用人民的本錢來做生意賺錢，對於中共的財政經濟，當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合作社的另一特別義務，便是收運鹽代金，『陝甘寧邊區』民衆因為人人都有運鹽義務，如果不想運鹽的話，便得要以五六千元交給合作社入股，用這批股的利息，作為合作社代為運鹽的費用，而不必再去親自運鹽，這筆收入，按照一百四十萬人口的比例看來，數目上大概是相當的可觀的。

『陝甘寧邊區』的合作社在吸收民間游資上，幫助中共解決了不少財政上的困難，在幫助『邊區銀行』發放貸款上，也給一般民衆發展『生產』上很不少的便利。因此在中共的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中，合作社是佔着一個很重要的成份的。

綜括起來說：中共經濟上的特點，是適應需要，加緊『生產』；在財政上的特點，是用在急務上，而不是平均分配，用在所需的必要上，而不是救少費多。兩者並具的特點，是拚命壓低目前的生活水準，拚命建立將來發展『事業』的因素。

五·中共的宣傳文化教育與社會司法

有人說：「中共之能有今天，實在是得力於兩件武器，一件是軍事，一件便是宣傳」。這句話，說得的確是十分中肯。在中共的組織裏，其所以對外發展的工具，軍事宣傳確是具有互不相讓的地位，而又能各居百分之五十的在嚴密的配合着的。

中共怎樣宣傳

中共的宣傳原則，可以用兩句話來作一簡單而扼要的說明。這兩句話，便是「隱己之惡揚己之善，」與「揚人之惡隱人之善。」這一個原則，中共宣傳方面的負責人是確實辦到了的。譬如說：中共的軍隊不守軍令而到處隨意的在其他國軍的駐防地內「游擊」，中共的宣傳却說這是爲了抗日，爲了縮小「淪陷」區。假如在政府公務人員中偶有一二不肖之徒觸犯了法律，中共的宣傳便要擴大的說這是中國政治的不「民主」所使然。於是，

在這種宣傳原則指導下的中共報紙上所發表的消息上看來，「陝甘寧邊區」遂成了「天堂」，而政府政權軍力所能達到的地方，則一律變成了「地獄」，凡是「陝甘寧邊區」裏的任何一件好事，就是小到巫神轉爲農夫，固然要歸功於中共的「民主」而大大的頂好頂好的歌頌一番；要是在政府的管轄區內發生了一件壞事，那怕這件壞事小到一個警察和一個司機發生鬪毆，也要歸罪於政府的「不民主」，而一面「特務特務」的罵上一頓，一面却如喪考妣般的嘆息着人民身體的「沒有自由」。

中共對於黨辦報紙是極端重視的。無論是「解放」是「新華」，負責人多半是中共中央高級幹部中最有能力的份子，毛澤東周恩來等，也都是常常直接參加報社言論的指導工作的。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便時常要送給毛澤東先生閱後再行發排，或竟是毛澤東先生自己執筆。所以，凡是中共所辦的報紙刊物中，都可以嗅到一股中共所謂的濃厚的「黨性」的氣息。

中共的宣傳技術有兩個着眼點，第一，是配合需要抓住機會。第二，是利用事實，抓

任對象。尤其是「整風」以後，一切的空洞的理論文章和長篇的訓話演講，都是被列在「黨八股」之中而打入了十八層地獄的。（陳紹禹秦邦憲等裝了一肚皮俄文原版書而現在竟噤若寒蟬，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中共的宣傳另外有一個特點，無論是原則上或技術上是都離不開這一個特點的。這個特點，可以叫做「進有收獲，退亦成功」。中共發動任何宣傳攻勢時，都必須要先考慮到失敗和成功的兩種後果。成功，當然是可以達到了積極方面的「建設性」的目的；失敗，也一定要能够在消極方面完成「破壞性」的任務。要是用俗語來說，可以講中共的宣傳第一目標是「損人利己」；而第二目標，則是「縱不利己也一定要使其損人」！

三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延安慶祝聯合國日大會，便是中共宣傳方面一個良好的典型例證，那時，因為正值潼關危急，靈寶失守，中共便在慶祝聯合國日的大會中臨時加了一個「要求國民政府給八路軍新四軍發槍發餉發藥，打到敵人進攻的地方去」的標語和「保衛西北，保衛西安」的口號。在中共自己，何嘗不知道自己的「游擊」軍力并不是以當潼關

正面戰場的重任？又何嘗不知道政府絕不會視戰事如兒戲一般的調他們的「游擊」部隊去守正面戰場？但是，中共的宣傳却硬是這樣的做了，爲什麼中共要這樣做呢？其目的大概不外兩端，第一、希望中外記者團能夠幫忙她這一次的宣傳攻勢，以遂成其要求政府「發槍發餉發藥」的目的。第二、設若政府仍然不理，則中共正好藉此來做爲攻擊政府的口實，并借提高「陝甘寧邊區」內民衆，對於自己勇於「抗戰」的信心和意志。

游擊式的教育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內所實施的教育制度，也是根據中共宣傳上的需要而擬定的。「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所審定的高級小學歷史課本的編者辛安亭，在書末「編者的話」中，便明寫着「這本書是根據中共中央宣傳部定的「小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寫的」。所以，在這部歷史課本的第三冊第十課中，就自我介紹的說：「從廣州起義開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走上蘇維埃革命運動的階段了」。中共教育硬向「黨化」的路上走，

在這裏可以得一明證。至於范文瀾所作的『中國通史簡論』，則又是一味的要找出『中國必定會走上蘇維埃革命』的歷史例證來；可惜的是這部偉大而荒唐的巨著祇出了上中兩篇，下篇則一直到中外記者團離開延安的時候范先生還是不曾寫完。其所以沒有寫完的原因，據范先生自己說，是由於他自己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還不夠，所以才寫不下去了。

中共的教育方針，既然是竭力的使其『黨化』，那末中共的教育制度又怎樣呢？如果僅就中外記者團在延安所參觀的各級學校而站在一般教育家立場上講來，其缺點之多，真可以說是一言難盡。但是，我們要知道中共的教育，是爲了黨的需要而產生的。根本上便與國家的百年樹人大計無關。所以，舉凡是一般人認爲違反世界民主之潮流不合我國抗建需要的課程，也許會竟然是中共本身能夠臨時應用能夠暫見功效的治病良方。

中共在延安所辦的高等教育學校，一共有三個：一個是中共黨辦的黨校，一個是『陝甘寧邊區政府』所辦的延大，還有一個，則是屬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抗大。這三個學校分工是異常精密的。黨校是中共專門訓練黨的幹部所在；延大則是爲了專門培養『陝甘

寧邊區」範圍內所急需的行政人員而設。抗大的訓練，則祇偏重軍事方面的幹部教育。這三個學校雖然各有不同的功課，而中心目標的一切必需「黨化」，則彼此之間，依然是並無二致。

黨校是中共黨內的最高學府，中外記者團的團員們都很想去一觀究竟，可惜延安主人爲我們所排的活動節目中沒有這一項，後來雖然我們再三的提出要求，而結果却依然是，「夫子之牆九仞不得其門而入」。因此，我們對黨校的一切情形，也就無法知道。據在黨校受過訓練的中共黨員們說，黨校的主要功課分爲兩種，一種是中共的「革命理論」一種是中共的「業務問題」。中共所謂的「革命理論」，便是要黨的幹部們怎樣將「馬列主義」——「透過民族形式」活用到我國目前的社會裏去。這一切功課，是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們親自擔任的。至於中共所謂的「業務問題」，則是偏重於黨務活動（包括「地下活動」的方法），這一項功課是用小組討論會方式來進行的，由受訓人員彼此互相討論，并集體的研究出一個解決方法來，再由中共中央的要人加以指導。黨校內受訓人員的成份，各階

層的人物都有，不過大多數是黨政軍文化各方面的主持人。

抗大，也是中外記者團未能參觀的一所學校。聽說，抗大的一般教育除了照例要以宣傳材料來培養受訓的各級軍隊幹部的仇恨心理以外，關於軍事技術方面的訓練，大概是分爲兩種，一種是應付敵軍的，另一種便是準備對付國軍的。據朱德對中外記者團的中國記者說：「中共軍隊，現在對於步步爲營的梅花陣的應付，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句話是頗可玩味的，因爲中國記者都知道，中共之所以要由贛南跑到陝北，便是爲了國軍在江西剿共時代所用的步步爲營的梅花陣的成功。抗大受訓的學員分爲兩種，一種是以前的紅軍老幹部，另一種則是新近招考的青年。軍隊政訓人員的訓練，也包括在抗大中而另編一隊。

延大是分做好幾個部門的。中外記者團參觀到的有行政學院，自然科學院魯迅藝術學院三部。這三個學院的共同課程是毛澤東先生的「政治理論」，中共的「革命人生觀」與「時事教育」。業務上的應用課，則同是爲了應付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目前的設施

而定。學生的來源分調訓與招考兩種，教授則全是由「陝甘寧邊區政府」各部門的主管人員兼任。所以，各科課程的內容幾乎除了「邊區」便不再有中國，除了蘇維埃，便不再有英美。以致於每個學生所學的東西，出了中共的小天地，便不能致用，甚至於出了「陝甘寧邊區」以後便無法在社會生存。

中共的高等教育入學資格，是沒有任何限制的，一個大字不識的中共幹部，也一樣的可以進延大讀書，同時，中共的各大學也沒有一定的修業年限，原則上雖然兩年，但是一年可以畢業，一個月也可以畢業，不畢業時，讀上個十年八年也無所謂。因此，延大的校長周揚便說過在延大父子同學，夫婦同學非常之多，而且夫婦同學時，還可以同住一間寢室。好在「邊區」的任何人都要「生產」的，住在學校裏天天要紡紗種地，在各機關裏一樣的要種地紡紗，當「公務員」吃的是小米公糧，當「學生」的生活，也決不會再降到吃稻草的程度。所以，在「陝甘寧邊區」內，「學生」並沒有同一般人有什麼不同之點。教授（專任）也和學生並沒有兩樣。

不寫黑暗的文藝

中共教育方針是這樣，中共的文化政策也是這樣的。毛澤東先生「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便很坦白的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的文化或文藝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一定的黨，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爲藝術而藝術，超階級超黨的藝術，與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因此，「陝甘寧邊區」裏的文化或文藝，便一定要屬於中共的黨，中共所指定的無產階級，與中共所要走的政治路線了。毛澤東先生反對「人類之愛」及「抽象的人性」，而認爲「在階級的社會裏，祇有階級的愛」，於是，延安的作家便得遵照着這一個指示寫。毛澤東先生反對寫「黑暗」，而認爲「蘇聯在社會建設時期裏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爲主，他們寫些工作中的缺點，但這種缺點只能成爲整個光明的陪襯，而不是一半對一半」。於是，延安的作家們，便得又跟着這一指示寫。

但是，「人類之愛」是從「人性」出發的。同一個黨，同一個階級同一條政治路線的

人，并不一定都有着「愛」的存在的。所以，中共的黨員王實味竟然寫出了一本「野百合花」，不顧一切的壓力而吐出了他對於同一個黨，同一個階級，同一個政治路線的高級同志們的不滿和「恨」意。所以，解放日報的副刊編輯丁玲，也不得不承認找不到可寫的題材而擱筆兩年之久。

如果「陝甘寧邊區」裏也有着文化或文藝的話，那末，這文化或文藝便可以說是中共宣傳部之下的一種工具。站在一切爲了宣傳的立場上說，中共對於文化人的運用和技術效果上當然是很好的；可是，那些在中共的運用和技術之下而生活着的作家們，却都不勝其寂寞之感了。「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蕭軍先生，便對中外記者團說過他的兩怕，他說：「我在延安有兩怕，一怕寫了文章無處發表，二怕這裏沒有社會生活」。

簡單的社會生活

「陝甘寧邊區」內的社會生活，簡直可以說是簡單得到了沒有的程度。毛澤東先生

天到晚歌頌「工、農、兵、」，除了「生產」「生產」又「生產」，根本上便不會也不敢想到自己除去「生產」還有着其他的作人的權利，一般智識份子呢，除了紡紗時間以外，所可能得到的一點空間，也只好默默的讓他消逝。在延安，祇有一份報紙，是中共黨辦的解放日報，「邊區」以外的報紙和刊物是看不見的，而延安本地却又沒有什麼刊物雜誌。

「陝甘寧邊區」內的社會生活既然簡單，生活的維持當然也就比較容易，因為延安到現在也還祇是一個農村社會，所以，一件棉襖，可以穿上三五年，並沒有什麼寒酸，一天吃兩餐小米飯也絕不至於餓壞。就這樣，生活問題總不能說是沒有解決；就是說這種生活就算是「豐衣足食」了，那也未嘗不可。

「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生活程度，大概可以分為三種，一種是自耕自食的農民，一種是自食其力的工人，另一種則是一切全靠老百姓的公務人員。據「陝甘寧邊區」貿易公司的總經理葉繼莊說：「公務人員因為一切既有公家供給，同時自己又動手生產的關係，在生活的享受上，要比一般人民多少優裕一點」。這句話，倒是真的。但是，公務人員的生

活，也有着各種不同的等次。地位愈高，公家的供給也就愈加優裕。甚至於夫妻同爲公務員而妻子的地位比不上丈夫時，也得要分桌吃飯分料穿衣，中外記者團在延安所住的交際處，處長金城便和太太不一道吃飯。公家的製服廠裏，有着一個幹服股，是專作高級幹部的服裝，高級幹部可以穿上產呢，而一般低級公務員却祇發老布軍裝。延安爲外國記者們準備一位女翻譯，便因爲一天到晚穿着老布軍裝，而使得我們一位近視眼的團員竟分不清是男是女。中共的這種供給階級是分得極嚴的，嚴到解放日報的社長和總編輯的伙食都不一樣。工人的待遇可算是第二等，由於「陝甘寧邊區」工人過分缺乏而中共又要大量生產的關係，差不多每個工廠的工人要做到十小時以上的工作，而另外還要自己生活，所以，按照情理講來，工人既已供獻出過分的勞力，則每一個月比一般人多吃上一斤牛肉，當然并不能算作過份。農人和商人大概在「陝甘寧邊區」裏所享受的生活是最低級的，在中共嚴格的管制下，商人能够存在本來便已經很不容易，要想大量賺錢，當然是絕對辦不到，農民呢？由於陝北的地質太差，而且祇能出產雜糧，所以一般農民們便無法求取較

好的生活，現在由於中共拚命督促生產，按家代爲擬定「生產計劃」以後，產量雖然已經增加，而農民們所過的生活，較之以前也並不見得有多大的差別。

活潑的司法

「陝甘寧邊區」裏人民的生活既然異常的簡單，則訴訟等事自然也就比較的少。中共不大用條文法律的，在「陝甘寧邊區」裏，司法也就附於行政而不獨立。一個「高等法院」以外還有一個「延安地方法院」，各縣裏則祇設一個「裁判員」，以管理訴訟案件。

「陝甘寧邊區」對於訴訟案件處理，並不需要根據條文再來判決，最通常所採用的方法是調解，即所謂馬錫五審判方式）和公開審判。中共對於這兩種方法的運用，是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的。第一、調解所以標榜「民主」，第二、公開審判則既可標榜民主，又能運用黨員來激動在場民衆的情緒，來對於被審者處以中共願處的罪名。

中共對於司法都是如此，則其特務的作風，也就可想而知了，毛澤東先生便對中外記者團的中國記者們說過：「如果我說我毛澤東不殺人，恐怕連鬼也不會相信，但是，如果

殺人而不能解決問題時，我一定還是不殺」。這幾句話，是頗爲坦白的，現在的中共特務人員的行動工作，便是第一步先行「爭取」，「爭取」不到，然後再繼之以「殺」。但是這種「爭取」，有時比較「殺」還要來得厲害的。中共的特務機關如保安處之類，現在便流行着一種所謂的「疲勞檢查」，其方法是以無數的特務人員向他們認爲「有問題」的人加以輪流的審問，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永不停止，永遠不准被審者得到一秒鐘的休息，這樣，一直到被審者疲勞得神志糲糊時，當然就不得不糊裏糊塗的一概承認。按照「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說法來看，中共這種「奪志」的刑法，其殘酷性是超人意想之外的。到被審者承認了中共特務人員所發的問題以後，中共便要這被審者再去向羣衆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便是中共所謂的「坦白運動」，如果這被審者的「坦白」被中共認爲不夠時，那末中共便要對於這位不「坦白」者加以「搶救」了，被中共搶救以後的人。據說是以後便很少和別人見面了。

「陝甘寧邊區」裏十萬樸實可愛的人民，便終年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中。

第五章 記者團在延安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陝甘寧邊區」內一共逗留了四十三天。在這四十三天內，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延安度過的。

疲勞招待與中外分居

也許，因為記者團準備前往延安參觀的消息醞釀得太久了罷，延安的主人在我們還沒有到達以前，便為我們排定了很多的活動節目。我們一到延安，這些活動節目便照着主人排定的程序進行起來。一直到記者團離開延安的最後一天，聽說是這些活動節目還不曾進行得完。

談話緊接着參觀，參觀又緊接着談話，從清晨進行到中午，從中午進行到晚間，如果

不是星期還有一天休息的話，我們甚至於連剪頭洗澡的空閒都無法得着。主人招待的盛情是可感的，但是，這種「餵填鴨」的招待方式，却使得我們的腦子都有點「消化不良」。所以，除了體重二百八十磅的福曼以外，其餘的團員都很少寫作。

有一團員說：「疲勞啊，我第一次在工作上感到了非常的疲勞」。另一位說：「敵人不是對重慶實行過疲勞轟炸嗎？今天我們又遇到疲勞參觀和疲勞談話了。到幾時疲勞才能告一段落呢？我連準備好的問題，都疲勞得懶得去問了」。

延安的主人為我們所排定的疲勞參觀和疲勞談話的節目，都是以「團」為主體的。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進行什麼活動節目，要去，便大家都去。這種集體行動，一直維持到了「陝甘寧邊區」以後，才正式宣告破產。有一次，在參觀一個被服廠時，時事新報的代表趙炳良先生半路上一人獨自的走慢了一步，跑到一家商店裏去買了一點東西。於是，我們參觀完畢剛才回到了休息處所，陪同參觀的主人便向記者團的正副領隊謝保樵鄧友德說：「這裏的老百姓都非常的野蠻，貴團團員如果像趙炳良先生這樣單獨亂跑，很可能

發生危險的。以後如再有此類事件因而發生了問題，請原諒，我們恕不負責」。從此以後，我們無論到那裏都很少單獨行動過。參觀也好，談話也好，想去，當然得去。不想去，也得同去。甚至連我們到住所附近去買一件東西，都不敢不請一位主人陪着。前重慶新華日報的女記者徐克立和太行新華日報的記者高戈，便是都經常的陪我們上街去買東西的兩位主人。

這種集體行動，在記者團裏，是分做兩組的，一組是中國記者和政府派的領隊祕書翻譯。另一組則全是外國記者。分組的工作是主人代做的，我們一到延安，住所便被分爲兩處，主人規定了記者團裏的中國人都一律住在山上，外國人則一律住在山下，住山上的兩人一間寢室，住山下的則每人可佔有一間。由重慶出發時，政府爲了外國記者不懂我國話，特派了兩位英語很好的翻譯人員隨同工作，一路上，外國記者可以說是沒有一天和這兩位翻譯離開過，到了延安，主人說：「這兩位翻譯用不着了，我們自己有人替外國記者翻譯」。於是，這兩位先生便和我們一道住上山去，一道的和我們集體行動。

因此，外國記者是否每天也集體行動，記者團裏的中國人是無從知道的。

延安沒有新聞檢查

延安，是新華日報所歌頌的「最民主的地方」，「最民主的地方」，當然是言論自由的。因此，延安對於新聞電訊都沒有檢查攔關。不過，記者團裏各記者要發電報，得先送給我們所裏的主人看一看，看過以後，主人像小學教員替小學生看卷子般的，用紅筆在原稿上畫上一個勾的記號，於是，這個電報通訊，便可以發出了。如果沒有這一畫，電報局是拒收的。（這一畫是否和簽字一樣有着一點特別的地方，我們因為不習慣作弊，並沒有畫過假記號發電報，所以，我們對於電報局怎樣分別真偽，也就無從知道。）

有一次，作者在中外記者團將要返渝的當兒，擬了一個電報，準備告訴重慶的讀者們，我們快要回來了。這電報的內容是這樣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參觀大致完畢，除了少數記者仍將留延進備再赴晉西北參觀外。其餘記者則一二日內即將離延返渝

云」。不料這樣一個電報竟然成了問題。

當作者將這個電報送給我們的住所的主人（交際處處長金城先生）畫一個「」號時，金城先生竟然拿着我們的原稿跑來了。

他問我說：「金先生這個電報，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改一改，可不可以？」我當時有點詫異，這樣的一個極普通電報有什麼可以改呢？難道主人要留我多住幾天嗎？再不然，就是寫錯了字。於是，我便向他說：「可以的！你認為那裏應當改，你便代勞改一下好了。」我這樣說，不過是我自己不知道從何改起的一句順口話，金城先生竟然誤會起來了。他連忙的向我說：「你金先生不要認為我是檢查你的電報，我不過有一點意見供獻給你，請你自己改一下，使得這個電報更符事實而已。我又不是重慶的新聞檢查處處長，那敢改你金先生的電報呢？」我聽了這話，知道他誤會了我的意思了，便馬上向他說：「請你不要誤會，我並沒有說你檢查我的電報的意思，現在，請你說，那一點應該改得更合事實，我馬上改正好了」。他聽了我這幾句話，便笑起來，他一面將我的原稿還給我，一面

向我說：「金先生這電報裏所寫的，「除少數記者仍將留延準備再赴晉西北參觀」，一句中「少數記者」的「少」字，可以不可以請你改作「多」字？」我聽了這話，倒真正的好笑起來，我便向他說：「我們記者團除了政府人員不算，純記者共十五人，現在只有五個記者留延安，十個記者都要回重慶去，你認爲「五」字的數目比「十」「這個數目」多嗎？」他馬上又解釋道：「不！因爲這五個人全是外國記者，至少你應該寫「除多數外國記者仍將留延」才對。「這一句話使我有點生了氣，我便直接的告訴他道：「我們的團是中外記者團，中國記者是團員，外國記者也是團員，我們一直都是用中外記者團的名義，從來不會分過中外，現在，我的電報內所指的多與少是中外記者團的團員數目，何況返渝的十人中也有外國記者，留延的六人也有着中國人，爲什麼一定要我改呢？」他又向我說：「金先生不要誤會，我不是一定要你改，我不過供獻你一點意見而已」。於是，我便向他道：「那很好，既然你不一定要我改，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少」字我不想改，因爲改了以後，更會與事實不符」。他聽了我的話，也有點生氣了，他馬上便站了起來向

我說：「金先生既然不接受我的意見，這個電報不能負責」。我告訴他說：「我的電報你很可以不負責，只要你畫上一個記號讓我發出去便好了」。他堅決的說：「我不能畫記號，這個電報你也不能發，你發也發不出去」。這一下，我真冒火了，我便一面將這個電報的原稿交給他，一面向他說：「你替我改了發也可以，你不發也可以，我自己實在是良心上不願改，我不能抹去事實，欺騙讀者。」他一面將我的電稿放在桌上，一面向我說：「那怎麼行，我又不是重慶的新聞檢查處處長，我怎敢改你的稿子，我又怎敢改你的電報」？說完了，他便去了。

我知道這電報他不畫一個記號電報局是不受的，只好將「少數記者」四字改爲「外籍記者五人」六字，再送給他去看，不久，原稿又退了回來，我沒有辦法可想，只好將電報送到電報局去，硬要電報局收下，并向電報局要了收條，不料我回到重慶將要一年了，這封電報到還沒有送來。報館和電報局結帳時，這封電報的電報費也不會收。

延長自由採訪的一幕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五日，中共在重慶的喉舌新華日報，用着很大的標題和篇幅，登出了一條消息，內容是說原駐「陝甘甯邊區」的十八集團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帶着×（大概是八字）路軍南下游擊支隊和豫鄂邊境和新×（大概是四）軍會師了。這條消息，在一般人看起來也許覺得並沒有什麼特別，但是，如果到過延安的人，看了這個消息，一定會感覺到奇怪的。

（一）據新華日報說，王震是帶着軍隊由延安到湘贛豫鄂邊區去打敵人的，但是，政府規定十八集團軍的戰鬥行列是第二戰區黃河北面，王震既然要打敵人，如果照常理來講，則由延安到黃河以北去作戰，至少要比到鄂豫湘贛邊境去少走很多的路，節省去很多的時間，並且，也可以省去很多行軍物力消耗，少走路和節省時間，都是可以提早和敵人在作戰的因素，節省物力，則更是戰勝敵人一大條件，現在，王震既然要打敵人，爲什麼不

就近到自己的範圍去，去早點把敵人消滅，却反而老遠的跑到豫鄂湘贛邊區去，其用意與理由究竟何在？

(二) 當記者圍在延安的時候，由共當局差不多每次談話都要說到政府「封鎖邊區」的問題，並且強調政府軍隊對於「邊區」的封鎖是如何的嚴密，軍力是如何的強大，「邊區」對外的交通在「封鎖」下是如何的困難等等，當記者圍經過中共所指的「封鎖線」時，發現那裏並沒有很多的政府軍隊，有些記者，還以為「封鎖邊區」的政府軍是在我們經過時才撤退的，現在我們看到王震竟能公然的帶着武裝部隊不但跑出延安，並且跑到了豫鄂湘贛的邊境，這真是一大奇事。在任何國家裏，軍隊的調防是必須經過政府的命令才能行動的，同時，政府如果沒有命令，而某一部隊自行開到某一地區去，則沿途駐防的軍隊，如何能任其通行無阻？這次王震率部由北南下，第一個問題，便是要經過中共當局所稱的「封鎖線」，第二個問題，便是要經過很多國軍駐防的地區，政府既沒有明令發表叫王震由北往南，則這些地區是如何經過的？這兩個問題，可能有兩個答案。一、中共所說

的「封鎖」也者，根本上便沒有這麼一回事。二、駐防各地的國軍，大概沒有在王震經過時阻攔王震，問他要軍事當局的命令。三、如果真有一「封鎖線」，如果沿途軍隊在王震經過時曾經盡了職責，向王震要防的令看的話，那末王震竟然能够由延安跑到豫鄂湘贛邊境，除了從天上飛過去以外，我們又能想像得到的，另外便祇能有拿起槍來蠻幹，在國軍不願發生糾紛的避讓下，所以才能通過這樣多的地區。至於以一隊人而又無重武器的部隊如何能經過很多的敵區，因為我們不願說王震與敵人早已默契，這裏便祇好不談了。

提起王震來，這個人在中外記者團各團員的記憶裏，印象大概都是很深刻的。我們剛踏進了「陝甘寧邊區」以後，第一個接觸到的延安中共人物，便是這位先生，他那時是十八集團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兼延安衛戍司令，兼「陝甘寧邊區延安分區」警備司令。從我們跨進「邊區」起，他便一直的陪着我們到達延安，到了延安，我們在疲勞參觀疲勞談話的招待下，便很少見到王旅長了。這位先生，是頗爲令人懷念的，因爲他「坦白」而又「真誠」，實在是不愧爲一個典型的中共幹部。這次，中共之所以要派他南下，也許便

是爲了他這種「真誠」「坦白」較其他幹部都要高出千倍的關係。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四日下午，我們在「陝甘寧邊區」的延安縣內，參觀了石油廠，回到我們的寓所以後，延長「縣長」熊生炳記者招待會舉行了。熊「縣長」報告延長縣變做「邊區」管轄的經過時，並且說，他自己之當了縣長，是全縣民衆選了出來的。當時我會請熊「縣長」說一說當選的經過和當選的情形以及選舉的方法等等，不料這位「縣長」先生竟然愈答我愈不懂，王旅長也起來幫他答復，仍是沒有人懂。糾纏了二十分鐘以後，周恩來的祕書陳家康先生便起來同我說：「我們的這位縣長。是農民出身，他根本便不懂什麼叫做直接民權，什麼叫間接民權，金先生的問題，我看最好是到了延安以後，我再找人答復如何？」當時，我便自動接受了陳先生的建議而宣告這一問題不必再行答復。

外國記者史坦因先生這時忽然站了起來，他說：「在延安的街上有入發現『打倒國民黨』的標語，這標語是誰貼的，什麼時候貼的，爲什麼要貼？這三個問題，我想熊縣長答復一下」。熊「縣長」還沒有開口，王旅長便很快的站了起來，他說：「我是陝甘寧邊區

延屬分區的警備司令，延長也是我的分區內的一縣，我可以代表熊縣長答復史坦因先生這個問題。但是，我要先問史坦因先生，這標語到底是誰看見的？」史坦因站起來說：「說是有人說的，不過請原諒我不能告訴你。」王旅長看見史坦因不肯指出人來，他便大聲向記者們說：「我相信延長的街上，一定沒有這樣一條標語，那位看見的我們可以一同去找。」當時，我覺得這一點點問題，根本上便不值得這樣的擴大，並且我也的確在中山市順興城門口看見貼有一條「打倒國民黨」的標語，一條「國民黨是害人的」春聯，便站了過來向王旅長說：「我是曾經看見的確有這樣的一條標語的。不過我覺得這樣晚的天，去找却大可不必。所以，我希望另談一個問題，而不要這樣僵持下去。」不料王旅長聽了我的話以後，竟然大怒起來，非要去找不可。大家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祇好跑了出去，在順興城的門口，這兩條標語竟不見了，但是有一位却發現地上的一堆碎紙，正是剛剛撕下來的這兩條標語的尸骸。拾起湊齊來一看，「打倒國民黨」，「國民黨是害人的」，十二個字，一個也不會缺少，當時便又回到住所繼續談話會的進行。這時，院內已經站滿了

人，當我們剛剛鬆了一口氣坐下之後，王旅長便發出了獅子般的怒吼：

「同志們，你們不要動怒！我有幾句話要向記者先生們講一講。」他一面舉着手指揮着站在院中並沒有作聲的「戰士」不要動怒，一面對我們吼了起來：

「各位記者先生：你們是來自中外的名新聞記者，你們應該是最富有正義感與最公正的先生，今天，我可以斷定的說，這兩條標語，一定是特務份子幹的！你們如果以新聞記者的身份到我們這裏來參觀，我們是非常歡迎的！但是，你們如果以這種特務作風來活動，老實說我非常的感到不高興！」他越說越氣大，說到這裏，便轉過臉向着我一個人說：「金先生，你是看見這條標語的，請你馬上打個電報回去，讓你代表的報紙登出這條消息來，就是讓重慶的民衆知道了在我們的「邊區」的延長縣裏發現了「打倒國民黨」的標語，也並不是我們的恥辱！」「戰士們，你們不必動怒，讓他發電去好了」。他向我說完以後，便又向站在他身後的戰士吼了一聲，悶悶的聲音便馬上響起來。

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好像很猛然的在我心頭打了一拳。使得我不得不站了起來，向

王旅長作了一個簡單申訴。

我站起來以後，首先便徵求他的同意，我問他：「我有幾句話想向王旅長申述一下可不可以？」他一面將一隻腳站在凳子上，一面點燃了他的烟斗，向我點了點頭。於是，我的話便繼續下去：

「我想向王旅長簡單的解釋三個問題。第一：標語我是看見的，但是，發問的是史坦因先生而不是我。我為什麼不問呢？因為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新聞。如果這標語是民衆自動貼的，那末不但不是你們的恥辱，而且正相反的應該是國民黨的恥辱。如果這條標語是你們共產黨貼的，那就更不足為奇了，因為我知道你們共產黨想打倒國民黨已經不是始自今天。這是我之所以沒有發問的原因。第二：我想說一說特務與記者的分別：特務是找情報的，新聞記者是找新聞的，這兩者之間的工作方式本來就沒有什麼不同，不過特務所找到的情報是祕密供給某一機關某一個人，而記者所採訪來的新聞，則一定要公開的獻給全國的同胞以至全世界的人類而已。同時，特務找到情報以後，便不再問其他，而記者則

不但要訪到新聞，而且要訪到新聞產生的過程與新聞產生的原因，再進一步，還要寫出論評來，對於新聞內的問題加以解剖，加以分晰，做出解決這一問題的結論，以供給報紙的讀者參攷。所以，嚴格的說起來，也許新聞記者比特務還要來得厲害，不過我今天可以向王旅長担保，我們中外記者團的團員中，絕對沒有半個特務！我們今後在「邊區」內，還是要採訪新聞，以所得的新聞，報導與各報的讀者。同時，王旅長要知道，是情報便是新聞；是新聞却不一定是情報。新聞的範圍，是比情報要來得廣的。第三：剛才王旅長請我打一個電報回去，報導這一條新聞，我現在要做一個解釋。首先，因為我認爲這不是一個新的新聞，連問都不問，當然，不會打電報回去。其次因爲我知道，凡是在國家政權所能達到的地方，政府都不准有「打倒共產黨」的言論的，所以，我便想到政府一定希望政權不能到達的地方，不要發現「打倒國民黨」的字樣。祇有這樣，才能談得上真正的團結，真正的抗戰。今天我竟然不幸而看到了這樣一個出諸政府希望之外的事件，在個人，已經是非常的痛心了，我義務上決不能再將這不幸傳播到重慶去讓我所代表的報紙的讀者

們再來一次和我一樣的痛心。同時，戰時的國家，都是有着新聞檢查制度的，英美有，蘇聯也有，我們中國當然也不會例外，即使我不得不聽王旅長的吩咐而將這消息寄回重慶，我相信而且敢向王旅長担保，重慶的新聞檢查員也一定不會將這一條消息放行。因為重慶的人們所知道的是團結，是抗戰！是真正的團結，是真正的抗戰！」

史坦因也認為王旅長的態度過於嚴重，而特務一詞，尤其不敢接受。他請王旅長所說的話收回，并說明他之所以要問這標語的原因，是希望中國真正是團結，不要打倒誰。他更告訴王旅長說，他在重慶聽他們共產黨的人說，「邊區」是最主張團結的。

話說到這裏，中央日報的張文白先生也站了起來，他說明新聞記者一向是歡喜隨便發問的，縱然問不對，也從來沒有人被問得生起氣來。所以他最後請王旅長不必動怒，就此告一段落。

突然，這幾句話竟觸怒了王旅長，他一脚將凳子踢了開去，站起身來，將桌子拚命的一拍，大聲責問張文白說：「你是代表中央日報的，中央日報是國民黨辦的！你是國民黨

的人，你憑什麼資格向我講話？你要講，先放了我們的葉挺來，不然，我們到外面講去！我是一個軍人，我是老粗！我就是這樣的不客氣，對你們國民黨有什麼客氣的！」這一來，當時秩序大亂，中共由延安派來招待我們的陳家康先生等都拚命的將王旅長拉了開去，我們也將張文白先生推進了食堂，一頓晚餐，就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吃了下去。

五日，行抵大村，途中有十幾個負過傷的戰士，在俯首耕田，王旅長從後面追上了我，他一面拍了一拍我的肩膀，一面向我說：「金先生我們這些戰士都是抗日負了傷的，現在却被你們國民黨「封鎖」在「邊區」裏，不得不自己耕田，你們國民黨的良心上過得去嗎？這些事情，金先生也應該多看一下啊，不要祇看「打倒國民黨」的標語啊」我聽了他的話祇好勉强的笑了一笑。想不到在我們離開延安不久之後，連幾個人都通不過去的「封鎖線」，竟然能讓他帶着一枝武裝部隊走了過去，實在真是一大奇蹟。今後如果能够再遇見他，不知道他對於「封鎖」二字又作何種解釋。

六日抵南泥灣，這是王震的旅司令部，一座座的窯洞，都是他的戰士們親自開的，王

旅長的辦公室是一所精緻的木房，也是他的戰士們修造的。中國人都住窯洞，外國朋友則搬進了木房子。晚間，王旅長舉行了一個秧歌舞的月光會歡迎我們，到了我們致謝詞的當兒，恰巧又輪到張文白先生，因為我們出發以來，便規定輪流的向主人致謝，既然輪到張文白先生，他自然不便推諉。於是他說話了，他小心翼翼的將王旅長部下的戰士們的生產工作稱讚了一番，又小心翼翼的走進窯洞去睡覺。第二天一早，我們吃了早飯，準備上車出發的時期，張文白先生才誠恐誠惶的同了王旅長一同走進餐堂。大家正有點詫異，王旅長又吼了起來：

諸位記者先生：我聽說諸位記者先生中有幾位很關心我們種鴉片的事情，張文白先生尤其是最關心的一位，我想留張先生在這裏多住幾天，好讓他親自到各處去找一找，免得他先生老是放心不下。」這一來，空氣馬上緊張了起來，張先生剛才想站起來講話，却被大家連拉帶推的送上了卡車，像裝貨的一樣，我們被裝到了延安。

在路上，我問張文白先生在進餐堂以前和王旅長單獨談了些什麼？張先生說：「王旅

長並沒有談什麼問題，祇是不斷的說：「你是特務，你是特務，」而要我承認我是特務。理由是：「昨天你說話的時候，為什麼不提到我們抗戰的事情？」就這樣被問了十幾分鐘，我們就被請出來吃飯了。如果不是要吃飯出發的話，也許他還要問下去。」

王震像貌生得頗爲「威武」，說一口道地的湖南話，聲音非常的有力。我們遇見他的時候他穿着一套灰布軍裝，腰裏不束布帶，腿上未打裹腿，足登多耳麻鞋，斜披一件黃呢上裝，「軍服」領上釘着兩塊紅底領章，嘴裏一天不斷的咬着烟斗。我們有一位團員問他：「王旅長領上釘的紅色領章，是代表什麼階級？」他直率的答道：「我們是沒有階級的，所以我們的領章上不用三角花和橫槓槓代表階級，而祇用顏色來代表兵種，我帶的紅色底領章的紅色，和他們外面軍隊一樣的代表着陸軍步兵。」這一位團員又問他道：「如果按照我國一般軍隊的規定，旅長的階級應該是少將了，將官因爲指揮的兵種多，所以將官便不能再分兵種而祇分海陸空軍。王旅長的編制，是純步兵旅，而沒有砲兵沒有輜重兵，沒有工兵沒有騎兵嗎？如果有的話，是不是也歸王旅長指揮？」這幾句話使他生氣了，他將

桌子一拍道：「當然歸我指揮！管他什麼兵種不兵種！」

王震，這位在自己範圍內的敵人不打，却偏要不遠千里跑到豫鄂湘贛邊境去「找」敵人打的「古怪的英雄」，便是這樣一個永遠令人懷念的人物。

活用辯證法

記者團裏有一位有着國民黨黨籍的團員，但是他却有三個兄弟爲要實現「信仰自由」而跑進了延安。這次我們到了延安的時候，這位先生心裏想着他的三個弟弟，當然會一同跑來看他，談一談別後的情形，和近幾年的家庭狀況。却不料到了延安以後，他的三個弟弟竟然一個也沒有來。他在奇怪的失望中，巧恰遇見了朱德的祕書長楊尙崑，楊先生是他十八年前的老朋友，雖然各人走上的政治道路不同，情感上當然還是很好，所以，這位團員便向楊先生問起他的三個弟弟來，并請楊先生代爲找他們來見一見，楊先生聽了他的話，便一口承認馬上叫他的弟弟來看他，并且告訴他：「你的三個令弟都很好，一位在解

放日報工作，一位在編譯處工作，另一位現在鄉間養病」。

楊先生走了以後，一連幾天過去了，我們這位團員的弟弟並沒有來，一直到我們六月十一日參觀解放日報時，我們這位團員的一個最小的弟弟才在請准了解放社的社長秦博古和總編輯陸定一之後，由副總編輯俞光生陪了出來，他見了我們這位團員的哥哥，只是機械般的點了點頭，死灰色面龐上，簡直找不出是一種什麼表情。我們參觀，他跟着我們走，我們吃飯，他也陪着我們坐，一直到我們臨走時候，我們這位團員又徵得了秦博古的同意，讓他第二天到我們的住所去談一談。

過了一天，我們這位團員在解放社的弟弟來了。另一位在編譯處的弟弟經過楊尙崑的努力也來了。除去那位在鄉下養病的以外，弟兄三人總算是見了面。這位團員問他們兩人常見面嗎？他們的回答是「不」，這種弟兄在一個城市內工作而不常見面的理由據他們兩人說，是「爲了各人工作的不同」。以後，我們從旁處聽到，在延安，某一機關的職員要到另一機關去看親友，得先由訪友者請准本機關的主官，發給介紹信，到被訪者的機關去

把介紹信呈給這被訪人的主管，經過談話以後，認為你有與這被訪人談話的必要時，被訪人才能够出來和你會面。告訴我們這種情形的人并同時聲明的這也僅是一般的規定如此，至於中共的要人，次要人，當然不在此例。

我們這位團員，在重慶雖然不見得闊綽，可是同他這兩位弟弟比起來，實在是綽綽有餘了。於是，這位團員便拿了一點法幣，一點香烟，一點白糖，分給這兩位弟弟，這些東西，在邊區內都是不容易找到的寶物，却不料他大的一個在編譯處工作的弟弟却不要。理由是這些東西他不需要，并且他也「有」！（這真是活天冤枉，延安的香烟，真得吃不進口，而法幣則是禁止流通的，糖呢，連我們在延安都沒有糖吃，而代以蜂蜜）。小的一個弟弟在解放社工作的，却歡天喜地的全都拿去。後來，聽說這位團員在編譯處工作的大弟弟回去之後，很受了主管官的嘉許，認為他能拒絕國民黨的哥哥的寶貴物資的引誘，實在不愧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我們聽了這話，都不禁為這個團員小的一個在解放社工作的弟弟擔心。因為按照我們的想法，不受東西的既已經得到嘉獎，受東西的當然便要

得到處討了。却不知我們對於辯證法太沒有研究了，後來聽說他那位在解放社工作的小弟，一樣的也受到了主官的獎語。理由是：他能够從他國民黨的哥哥那裏取得了「邊區」不可多得的寶貴的物品回來，至少可以解決了他本身生活上的需要問題，國民黨的哥哥幫助共產黨的弟弟解決生活問題，也就等於間接的由國民黨幫助了共產黨。所以，他接受了東西也沒有錯。

在我們快要離開延安的期間，這位團員便將他所帶的東西中笨重而不方便乘飛機的東西，全都給了這兩位弟弟，那位在編譯處工作的大弟弟，就是上次不要糖，烟法幣的那位，這次忽然高興起來，要他哥哥把一條白西裝褲給他留下。我們那位團員聽了他的話非常的奇怪，一面毫不遲疑的將白西裝褲交給他，一面便問他爲什麼對白西裝褲獨這樣感到興趣？他那位大弟弟的回答好極了，他說：「我有了這條白西裝褲，在本機關舉行跳舞會的時候，可以出出風頭了」。

提起延安的跳舞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爲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所以

美記者史諾說：「結婚，是中共的要人們唯一的奢侈」。那裏不是要人便怎樣辦呢？於是，不知是誰，（也許是毛澤東先生。聽說他是很好跳舞的）。想出了這個每機關星期六舉行跳舞會的辦法來，以調劑一下這種男多女少的不協調的空氣。所以，延安的各機關，每星期六都有着跳舞晚會的。自然，跳舞會裏有時也免不了男多女少的現象。在女子不够分配的時候，只好男的抱着男的對跳，到下一個節目開始時，再分開各自去找女的舞伴。

我們在延安的時候，魯迅學院也曾舉行了一個跳舞晚會招待我們。在重慶跳不到舞的團員們，當然是大過其癮，就是不會跳的團員，有時也却不了小姐們再三邀請的情面，而不得不下場去應酬一番。（男多女少的現象，在這天晚上，到并不見得嚴重，也許是延安所有的會跳舞的小姐都集中了的緣故）。在廣場的土地上，華爾茲探戈以後繼以大鑼大鼓的秧歌，扭來扭去，扭得倒也好玩。作者因為抗戰開始以後，對此調不彈已久，惟恐脚步生疏，踏破了赤足草履的小姐們的玉腳，始終未敢下「池」，以致於連却了小姐們幾次相邀的盛意，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有一點不勝歉然之至。

附錄：延安歸來有感

這篇文章是作者於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由延安歸來後在中央廣

播電台的廣播講演詞

各位同志，各位同胞，本人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西北各地去參觀了兩個多月，今天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向諸位談一談西行的見聞，個人覺得非常高興。

這次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西北各地逗留得最久的地方，便是陝北的延安，所以，現在我所要向各位報告的「西行漫談」也就是祇限於在延安一個多月的見聞和觀感。

大家都知道。延安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席毛澤東，就經常的駐在延安，指揮着他的黨員和軍隊，統治着所謂「陝甘寧邊區」的一百四十幾萬的人民，所以，一提起延安兩字來，大家都不免有一種神祕的感覺，延安到底是地獄呢還是天堂？

附錄 延安歸來有感

延安和重慶又有什麼區別？現在，我可以將我個人的遭遇和見聞，大概的向各位介紹一下。

陝北，本來就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地瘠民貧的一個所在，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四年的這一段期間，又經過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等所謂的「革命」和「游擊」所以就更鬧得十室九空，到處充滿一片荒涼景象了，一直到現在為止，這些斷壁殘垣的遺跡，還保留着不會洗去。

民國二十四年，毛澤東、朱德、由江西跑進延安，同劉高等打夥合作，陝北的局面，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到底比劉志丹等聰明一些，他們一到陝北，便鑒於當地的地廣人稀，祇要有勞力，就不愁沒有飯吃，所以當時的毛澤東就不得不收拾起他在江西時所實行的那一套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而也打起三民主義的招牌來，以號召陝北的民衆了。

從民國十九年到現在，共產黨之在陝北，已經有了十五年的歷史，在這十五年中，共

產黨的「政策」，是有不斷的變化的。無論是從「沒收土地」變爲「二五減租」，或是由「要求三八制」變爲「努力生產運動」，而陝北民衆們，都依舊的保持着原有的樸實和真誠。

現在陝北的工人和農民，大概每天都有着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他們所得的報酬，雖然僅僅是三餐小米，一套布衣，而他們工作的勤奮，却始終是絲毫不懈，也許，在他們的內心裏，正深含着無限的悲苦和酸辛，可是，在共產黨利用「抗日必需努力生產」的號召下，我們却從來不會聽到他們吐露過半句怨言。這種人民，真不愧是黃帝的肖子賢孫，真不愧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個人在重慶遙想到陝北的同胞，真是不勝其懷念與關切。

談到陝北的民衆生活，在我們的眼光裏看起來，真是不知道已經低到什麼程度，他們所吃的小米。較之我們的平價米不知壞多少倍。他們以一年或兩年的過分的辛勞所換到的一件布衣比起我們的買平價布來，更不知道要困難多少倍，但是共產黨要他們說「現

在已經是豐衣足食了』，他們於是就毫不抗拒的一致點着頭說：『我們已經是『豐衣足食』了』。

所以，當周恩來問到本人對於延安的觀感時，我就老老实實的和他說，「陝北民衆的勤奮，確實是遠較重慶爲佳。而自由活潑的程度，却遠不如重慶」。

當時，我同周恩來說：「周先生是到過重慶的，重慶民衆對於政府的批評，周先生也應該聽到過，可是我們到了陝北以後，却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批評政治好壞和中共的一切措施，人民當真的就沒有一個不滿嗎？就是記者團和毛澤東先生談天時，他也不會斷然的承認。那麼，人民爲什麼不講呢？不用說，當然是由於「不敢」，中共是一天到晚在喊「民主」的，我想不到在中共「治下」的人民，竟然是這樣的沉默。我雖然不敢說這是中共的不「民主」所使然，而民衆自由活潑空氣的養成，中共似乎是仍要加點努力」。周恩來對於我的這個「建議」，竟然也表示了接受。

講到這裏，我想起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送給我們的大地圖來，在這張地圖上，全

國的各省裏，大概都有用紅筆圈着的「中共軍事根據地」，祇有江西一省的區域裏，却保留着一片潔白，江西爲什麼沒有共產黨呢？有人說，這是同患傷寒病一樣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害了一次傷寒病，給醫好了以後，便一生也不會再發，這是爲了傷寒病菌存在着免疫性的關係，傷寒菌一侵入人體，除非是它永不離開，一直到那人病死，要是它一被醫藥驅走，他本身所遺留下的毒素，便會制止它第二次再來，拿種種說法來看共產黨過去的「政策」，確實是已經適用於江西，至於將來是否也適用於陝北，現在，我們都還不能下一個肯定的斷語。

陝北的一般人民的生活，既是如此，一般公教人員和部隊裏的士兵呢？大致的情形也是這樣的。

陝北的公務員，是除了光吃小米以外，沒有計給薪給的，據說是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一兩套衣服。如果是除此之外還要想買點別的東西或是抽抽紙烟，那就非得另外「生產」不可了。所以，陝北的公務員除去辦公之外，還要種地紡紗，並且，這種「生產」的收穫，

并不完全屬於自己，其中還要提出一部份來繳給服務機關，因此，陝北的公務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沒有家眷的，有的雖然也結了婚，而夫妻們却仍舊是各過各的生活，很難組織所謂新「家庭」。

軍人的生活就更不用說了，我們所看到的三五九旅，現在全部的精力和時間，都放在「生產運動」上，所以「開荒」的成績也就特別的好，他們除了自己的衣食住可以全部自給以外，還可以繳給「公家」很多的「公糧」。因此，全旅士兵的手上，大多數全磨成了血泡。在洛川，我們曾經遇到九個不堪忍受這種過分的勞力的榨壓而逃出來的士兵。

三五九旅是中共和共的精銳部隊之一，在陝北從事「開荒」，已經有了四年多的歷史，所以他們有着一塊良好的墾區，叫做「陝北的江南」的南泥灣。這塊墾區的主人，便是旅長王震，他們又有着不少的「軍營商店」，叫做「團結部軍人合作社」，王震便是合作社的大老。

提起王震來，這個人是非常的有趣的：

有一次，記者圍在延長縣的一家門上，發現了裏面有一幅內有「打倒國民黨」字句的春聯，有一位外籍同業史坦因先生，對此事向王震提出了質問，王震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堅持要到街上去找，結果竟然給我們找到了，果有其事，從街上回到我們的住宿地後，王震惱羞成怒的罵記者團全是「特務」，本人便和史坦因先生向王震提出了抗議，請他將所說的話收回，却不知抗議的結果，竟然使他遷怒到中央日報的代表張文伯先生身上去，張先生剛剛站起來還沒有講到幾句話，王震便命令着他道：「我不准你說，你是中央日報的，要說，我們單獨的到八面去談判」。他對於記者團這種強硬的仇視態度，隨我們怎樣解釋，他却始終的保持着，一直保持到和我們分手，似乎還餘怒未息，如果用毛澤東的話來批評他，他真可以說是一個「頑固份子」，毛澤東解釋甚麼叫做「頑固份子」時說：「固者、硬也、頑者，今天明天，後天都不進步之謂也。」這幾句話，對王震用來，真是再恰當不過的，現在我們再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王震「真是頑固專門學校畢業的，他今天頑固，明天頑固，後天還是頑固。」

最後，說到陝北的教員和學生的生活，那就更奇怪了，我們參觀過兩個學校，一個叫「延大」，是屬於所謂「陝甘寧邊區政府」的，一個叫「醫大」，是屬於十八集團軍「留守兵團」的，我們去的時候，並不是假期，但是兩個學校却都沒有上課，大禮堂裏放着幾十架紡車，男女學生都在努力的爭取「紡紗突擊手」的頭銜。

我們對於參觀陝北學校的感想，可以改四句木蘭詞來加以說明，這四句詞：是「唧唧復唧唧，師生當戶織，不聞讀書聲，但見紡紗急」。

陝北的一般生活情形，既如此單調，那末，陝北一般人的心情，又是怎樣的，可以說他們的一般的心情，都同生活的單調一樣的寂寞。

因為延安只有一家中共辦的解放日報和一家羣衆報，對於我們前方和後方的好消息，是從來不大刊載的，所以陝北的同胞們對於我們前方和後方的情況，都異常的隔膜和關切。

所謂「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蕭軍先生和女作家陳學昭女士，都曾表示過願意到重慶來看看的願望，蕭軍並對記者團說出了他在延安的兩怕，一怕沒有社會生活，二怕寫

了東西無處出版，這兩句話，是很可以代表一般人的，可惜當「蕭參議員」這幾句話說了不幾天以後，解放日報的副刊上，便有人對這話提出了所謂的「批評」，此後我們沒有見過蕭先生，所以不知道是否要「坦白」一下來承認自己的「錯誤」。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向各位的報告，祇好就此止住，談的拉雜而無條理，個人非常的覺得抱歉，如果諸位要想問一問「延安到底是地獄呢還是天堂」？我想在我這一段簡單的報告裏，各位一定可以用自己的看法來找一個答案。

延安見聞錄

結語

寫完了這本小冊子，覺得還有幾句話要說一說。於是便提起筆來，寫上這麼一個結論。

第一：我願意告訴讀者們，這本小冊子裏的材料來源：關於中共的政策和理論轉變方面，大多數是根據中共要人毛澤東周恩來諸先生親口說的話或者根據他們的文章而加以整理寫的。關於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則多半是作者由重慶到延安的旅行期間，親自在各地聽到參加過「長征」的人士所口述，并根據中共所發表的記事文（如史蹟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等）分別參考寫成。於十八集團軍抗戰以後的情形和「陝甘寧邊區」問題的材料，則有一小部份是得自閻錫山長官處，一大部份則是政府明令發表公佈在報上的，以後「陝甘寧邊區」的今日見聞，和記者團在延安的活動，則是我親自見到親自參加

的了。

第二 我還想告訴讀者們，凡是有這本小冊子的讀者，無論是國民黨的黨員也好，共產黨的黨員也好，如果對於我這本小冊子有什麼問題時，不管是用信件來和我討論或是在報紙雜雜上公開的給我指正，我是非常的歡迎和感謝。但爲我這一本小冊子寫的實在太匆促了，從開始準備到寫完爲止。僅僅一個月左右，遺漏疏忽的地方，自然不免很多。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一日於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延安見聞錄

全一冊 定價二元整

著者 金東平

發行者 民族書店

印刷者 民族書店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均有出售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04

1500